

文化冷戰：

美國對香港高校的交流計劃

陳 學 然^{*}

張 志 翔^{**}

摘 要

冷戰初期，鑒於中美關係現狀及香港地位之重要性與特殊性，美國於 1950 至 1960 年代利用各種基金會在港掀起「文化冷戰」。一方面，美國國務院以教育交流為名邀請香港學生赴美，培養香港學生領袖；具體做法是，安排他們體驗美國高校的民主政治與社會文化；讓他們參觀美國重要的政治、經濟和文化機構，藉以感受美國的現代化成就，由此而在香港青年心中構建起抗衡共產主義、圍堵共產中國的「心防」。另一方面，美國通過「美援」，將香港私立專上院校的教育與美國大學制度接軌，安排軍政人員藉著在港高校開展的各種捐資和文娛康樂活動以及探訪香港的知識社群，由此建立起人際網絡，藉以實現重塑亞洲政治格局的目的，將英治香港從中英之間的轉口港轉變為美國主導的亞太反共體系的一部分。本文同樣重視香港這一國際城

* 作者現為香港城市大學中文及歷史學系副教授。

** 作者現為香港城市大學中文及歷史學系博士生。

市的多元性與複雜性，從參與者角度探析美國的「交流計劃」，其原初意圖不能完全達至的原因。最後，本文希望大家看到在美國對港的交流計劃過程中，香港在中美對峙的格局下所扮演的角色。

關鍵詞：冷戰香港、美國因素、私立專上院校、文化冷戰、交流計劃

Cultural Cold War:

American Exchange Programs for Hong Kong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es

Hok-yin Chan^{*}

Zhixiang Zhang^{**}

Abstract

At the dawn of the Cold War, Hong Kong was a British colony in front of the “Bamboo Curtain.” Based on Hong Kong’s strategic importance and particular values in the Sino-American confrontation, American policymakers used Hong Kong to start a cultural cold war against Communist China in the 1950s and 1960s. Hong Kong scholars and students were arranged by the State Department or US NGOs to visit America to learn American values and democracy. In America, Hong Kong scholars and students met with American politicians, leaders of American student associations, organizers of social movements, and

*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and History,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 Ph.D, student, Department of Chinese and History,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other prominent figures. In the name of educational exchange, American military and administrative personnel also went to Hong Kong and built networks with Hong Kong intellectual circles. Different from current studies, this paper will focus on three neglected issues. The first issue is American military and administrative personnel who were responsible for building links with Hong Kong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The second issue is American patterns of operating student activities on campus and off campus. The third issue is Hong Kong scholars' and students' exchange activities in America. American educational exchange programs had a deep influence on Hong Kong students in the 1950s and 1960s. American Exchange Programs aimed to reconstruct Asia. Hong Kong was transformed from Britain's entrepôt to a member of the US-centric anti-communist bloc in Asia-Pacific. However, another trend of thought, "nationalism," also influenced Hong Kong students in the same period. "Nationalism" let some Hong Kong students view American exchange programs as a new form of colonization, which exceeded American policymakers' estimate. The interactions between different influences reflect the complicated context of Hong Kong as an international city. By analyzing the neglected matters, this paper will explore the history of private post-secondary colleges in Hong Kong and the complexity of Hong Kong society.

Keywords: Cold War Hong Kong, American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Chinese post-secondary colleges, cultural cold war, exchange programs

文化冷戰：

美國對香港高校的交流計劃*

陳學然、張志翔

一、美國在 1950 年代末增強在港的影響力

冷戰時期，香港作為東西方兩大陣營對峙的重要陣地，多方勢力均在此地展開各種政治、經濟和文化等活動。統治香港的英國政府基於英國自身綜合國力衰退，自 1950 年代中期便把英國海軍撤離遠東海域，將活動重點放回歐洲本土，不太重視香港的軍事防務，香港英國殖民地政府（簡稱港府）進而面對解放軍隨時會越境占領香港的處境。這一處境使港府在治港政策上進退維谷，欠缺長遠的社會規劃。然而，在東西方冷戰氛圍下，與英國同屬西方陣營的美國因為韓戰、越戰之故而在東亞投入大量軍事、情報人員；戰爭讓美軍常常借道香港水域南上北下，補給生活用品以及軍需物品；這樣也就間接使得美國在一定程度上成為了香港水域一股經常性存在的、港府可尋求協助的軍事力量。協防香港脆弱防務這點正好合乎港府需要，為美國獲得

* 本文是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研究資助局撥款資助項目：「香港私立專上院校發展探微：1950-1970 年代」（計劃編號 GRF-11617116）的階段性研究成果。謹向該局致謝！此外，本文曾於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潘光哲研究員主辦的「東亞冷戰史的重構」國際學術研討會（2018 年 11 月 19-20 日）上宣讀，感謝與會師友給予的寶貴意見！

了在香港活動的空間與平臺。

冷戰意味著兩大陣營的對峙與封鎖，香港這類處在兩大陣營之間的特殊城市，不同陣營爲了爭奪這類邊界城市的歸屬以及在此展開的情報爭奪戰，往往讓這個面積細小的城市因爲各種對峙、互動或交流活動的展開而變得異常熱鬧。一些研究指出，冷戰時期的香港對美國來說是「『自由世界』的象徵」，是美國觀察中國的「咽喉之地」，是美國在遠東的「重要的情報和宣傳中心、難民的避難所，以及資本主義生活方式的櫥窗」。¹因爲英國要借助美國的軍事實力來維護其在香港或遠東的利權，香港遂成爲美國「蒐集情報、實行出口管制、發動宣傳戰，甚至執行秘密行動」的基地。1950年代末開始，美國情報機構美國新聞署（United States Information Agency），把香港視爲製作針對亞洲的反共心理戰文宣材料基地，逐漸增加對港教育機構的文化影響。²但是，1950年代末開始，港府不願被美國的冷戰政策拖進反共泥潭而公然得罪北京，故對美國的反共戰略不願亦步亦趨，導致雙方在冷戰時期處於既矛盾又合作的微妙狀態之下。這也直接反映在港府與美國關於日後在港設立中文大學的複雜態度上。根據港府文件，參與籌設香港中文大學的英國顧問皮理斯（K. E. Priestley，?-?）便認爲：新亞書院、崇基學院、聯合書院這些受美國基金會資助的私立專上院校，如果被運用得好的話，會大有益處——港府既可利用美國提供的資金、人員來彌補英方自身資源投入的不足，使香港得以順利發展高等教育；同時也能讓那些從內地南下香港的不同群體各得其所，發揮所長。³港府如何通過吸納收編中文高等院校、構建英方在香港

¹ Memorandum, "US Policy on Hong Kong," James S. Lay, JR. Executive Secretary to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11 June 1960, NSC6007/1, 8.

² 麥志坤著，林立偉譯：《冷戰與香港：英美關係 1949-1957》（香港：中華書局，2018年），頁 1-2、5、248-249。

³ K. E. Priestley: Is it desirable or necessary that post-secondary colleges in Hong Kong should be employed to grant degree following courses given in the medium of Chinese, 1 August 1957, 6. HKRS 163-1-2048.

教育界的「霸權」，可參看黃庭康的研究。⁴ 本文在現有研究的基礎上，想要補充的是冷戰時期於香港構建「霸權」的除了港府外，還有美國。與港府不同的是，美國並非是香港執政的力量，而是作為一種外國力量進入香港，故它不能像港府一樣直接推出政策、法制和行政手段來規管教育及社會文化發展，只能在港府法律政策不涉及的領域或是在香港以外的地方施加自身的影響力，這使得美國在港構建霸權的方式相應地較為注重軟實力的宣傳，同時也把香港的教育出路推向國際化——亦即變相是美國化。

戰後英國治港所繼承的仍是其傳統的管理殖民地觀念，根據曾銳生的研究，自1947年葛量洪（Alexander Grantham，1899-1978）擔任港督後，便擱置了前任港督楊慕琦（Mark Young，1886-1974）在「楊慕琦計劃」（“The Young Plan”）中提出的設立民選市議會（Municipal Council）的主張，此後英治香港的民主一直處於被「擱置」的狀態（Democracy Shelved）。⁵ 這種民主被擱置的情況亦影響到教育界，葛量洪頒布的《教育條例》，便對學校的學生團體的言論與政治活動有諸多嚴格的監管。只從英方入手，就忽略了1960年代開始在香港中

⁴ 黃庭康的研究中「霸權」的概念，主要是指通過吸納而非消除從屬群體的文化的方式，將管治者的文化融入被管治者既有的權力關係中。具體到香港，則是分析港府如何通過教育政策，運用警察規管、資歷認證與控制資助等手段，構建自身在教育界的霸權，並探討港府這一霸權如何令香港人去國族認同。本文探討美國的「霸權」，「霸權」的概念也與黃氏相同，只是美國並非香港的管治者，故其方式更加是滲入式的。這一霸權的目的，希望吸納香港的私立專上院校與青年學生為美國的冷戰反共計劃服務。黃庭康的研究，見 Ting-Hong Wong, *Hegemonies Compared: State Formation and Chinese School Politics in Postwar Singapore and Hong Kong*, 3. Ting-Hong Wong, “Comparing State Hegemonies: Chinese Universities in Postwar Singapore and Hong Kong,”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of Education* 26, no. 2 (April 2005): 199-218。

⁵ 有關楊慕琦計劃的具體措施及葛量洪的態度，可參看曾銳生著作。Democracy Shelved: Great Britain, China, and Attempts at Constitutional Reform in Hong Kong, 1945-1952 一書。Steve Tsang, *Democracy Shelved: Great Britain, China, and Attempts at Constitutional Reform in Hong Kong, 1945-1952* (Hong Kong;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文高等教育界的「民主」文化的形成與發展。根據專上院校的院校記載看，1960年代美國就通過交流活動，讓香港學生赴美體驗民主並參與美國學生會政治活動。⁶而美國則因應冷戰局勢希望在政治文化上重新整合亞洲的國家地區，並以香港為冷戰前線或反共前哨地，由此構建一套以美國為中心、跨國家地區的反共全球政治體系。美國除了在香港建立美國新聞處辦公室（United States Information Service Hong Kong）以推行文化交流外，也通過眾多的基金會組織資助在港知識分子及其文化教育事業，借此實現反共目的。我們甚至可以把美國在香港推行的各種基金會的資助，或者是當中的互動情況看成是濫觴自1947年的「馬歇爾計劃」（The Marshall Plan）。該計劃幫助戰後歐洲社會秩序及經濟重建，同時有意遏制當時仍屬戰後同盟關係的蘇聯在歐洲勢力的擴張。當然，該計劃最後反而加速冷戰時代來臨，在促進歐洲一體化的同時加深了東西方兩極分化。⁷在香港，美國基金會進入高校知識社群，其深層目的也不外乎統合在港反共勢力以遏制共產主義擴散，但其結果最後也難免激化不同陣營的對立情況。

美國對港文化交流政策的研究或者是政治工作的探討，無疑已有一定的研究成果。但現有研究主要集中在美國大的戰略規劃，對美方人員與香港知識社群的往來和在地中文高等院校學生的認知情況都著墨不多。此外，現有研究在分析美國對香港的文化冷戰時，所探討的「文化冷戰」類型主要還是集中於媒體出版這一類，而對課外活動、

⁶ 除了美國，港人冷戰時期關於民主和學生運動的想法另一方面也受到紀念「五四」的活動影響，這一方面的研究可參看陳學然：《五四在香港：殖民情境、民族主義與本土意識》（香港：中華書局，2014年），頁217-295。

⁷ Barry Eichengreen, "Lessons from the Marshall Plan," in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Background Papers*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2011); Mikko Majander, "The Limits of Sovereignty. Finland and the Question of the Marshall Plan in 1947," *Scandinavian Journal of History* 19 (1994): 309-326. J. Haas, "60 Years of Marshall Plan Aid: A Critical Appraisal from an Austrian Perspective," *Monetary Policy & the Economy* 2 (2007): 126-139.

學生會議、國際訪問和領袖計劃等交流活動欠缺更為深入細緻的探究。⁸ 本文將建基於當前學者的固有研究，以「詳他們之所略」的原則對一些未有及時展開的研究領域作出深細探究。本文之撰述，將會透過未有受學界注意的「遠東學生領袖計劃」(Far East Student Leaders Project) 和「國際生活實驗」⁹ (The Experiment in International Living, 也譯作國際生活體驗會) 舉辦的文化交流、考察計劃，探討由美國情治部門策劃的交流活動所隱涵的文化冷戰構想與心理戰策略，藉以在更宏觀的冷戰結構下，重新審視美國的「交流活動」。要之，這種「交流活動」大致上是以以下數個問題為思考中心而展開的。第一，如何讓交流國家／區域服膺於美國的冷戰戰略；第二，美國應以何種「國

⁸ 相關研究可參考于群、程舒偉：〈美國的香港政策(1942-1960)〉，《歷史研究》1997年第3期，頁53-66。郭永虎：〈20世紀五六十年代美國在香港的意識形態宣傳和滲透〉，《當代中國史研究》第2期(2016年3月)，頁16-24。張楊：〈冷戰共識——論美國政府與基金會對亞洲的教育援助項目(1953-1961)〉，《武漢大學學報(人文科學版)》第66卷第3期(2013年5月)，頁60-68。張楊：〈亞洲基金會：香港中文大學創建背後的美國推手〉，《當代中國史研究》第22卷第2期(2015年3月)，頁91-102。周愛靈：《花果飄零：冷戰時期殖民地的新亞書院》(香港：香港商務印書館，2010年)。葉霖：《在中國的影子下：美國對香港的外交政策1945-1972》(香港：中華書局，2018年)，頁147-148。翟韜：〈美國對東南亞華人宣傳政策的演變(1949-1964)〉，《美國研究》2013年第1期，頁117-137。翟韜：〈冷戰紙彈：美國宣傳機構在香港主辦中文書刊研究〉，《史學集刊》2016年第1期，頁71-83。Xun Lu, "The American Cold War in Hong Kong 1949-60: Intelligence and Propaganda," in *Hong Kong in the Cold War*, eds. Priscilla Roberts and John M. Carroll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17-140。Priscilla Roberts, "Cold War Hong Kong Juggling Opposing Forces and Identities," in *Hong Kong in the Cold War*, 26-59。

⁹ 相關研究目前十分有限，以下兩篇文獻提及這個活動如何由針對高中生的文化活動(a high school cultural immersion program)轉變為由肯尼迪(John F. Kennedy, 1917-1963)總統設立的國際組織和平隊(Peace Corps)服務機構，對於這一組織從事冷戰海外教育交流則未見談及。Eugene G. Schwartz ed., *American Students Organize Founding the National Student Association After World War II* (Westport, Conn: American Council on Education, 2006)。Charles J. Wetzel, "Peace Corps in Our Past," *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365 (May 1966): 1-11。

際化」的多元方式改變外國青年學生的意識形態；第三，美國與交流對象彼此之間該如何通過教育文化體制的接軌和人員網絡建立長遠關係，由此而改變地緣政治格局，最終確立起美國的主導地位。

值得注意的是，從公開的政府檔案中，本文述及的不少組織，其可供查閱的官方資料充其量只是極少量的介紹性資料，甚至有不少是沒有辦法在所謂的官方檔案裡可以找到。有趣的是，這些處於一種被「消失」狀態的檔案或數據，竟然散落於院校報刊資料和學生雜誌當中，為我們的研究提供了不少值得借鑒的歷史材料。¹⁰ 本文分析執行美國冷戰戰略的組織，有部分並沒有隨著冷戰結束而停止運作，而是一直運作至今；參與計劃的人員有不少現今擔任重要職位。這些機構在今天的運作目的，與它們在上世紀 50 年代至 60 年代所秉持的不一定相同，甚至在功能或角色上也沒有了當年的政治色彩，但這些無阻於我們對它們當年在香港的活動進行學術研究。

要之，上述那些未經學界關注或探究的問題，將可讓我們看見香港高校師生與美國政界的互動往來情況，這些探討也將讓我們能更多層次和以更豐富的視野觀察香港的地緣特色以及美國在香港展開的文化冷戰計劃。當中國大陸政治趨向封閉或是與國際關係相互對立時，香港的交流作用便告浮現，冷戰雖意味著兩大陣營的對峙與封鎖，但

¹⁰ 就筆者目前有限的知識與數據蒐集，官方檔案很少記錄遠東學生領袖計劃與國際生活實驗。以中情局檔案庫為例，它共有 14 個檔案，但都只是很簡單地提及國際生活實驗這一組織的名稱，未載有關於這一組織的活動內容，更沒有它們在香港的活動情況。遠東學生領袖計劃的資料則付諸闕如。其它的檔案如美國國會圖書館、美國國家檔案和記錄管理局、斯坦福大學、哈佛大學圖書館、肯尼迪圖書館、艾森豪威爾圖書館等雖藏有國際生活實驗的簡單數據介紹，但均未提及它在香港的活動情況，遠東學生領袖計劃則更未曾提及。威爾遜國際學者中心收藏的「冷戰國際史計劃電子檔案」，收錄了大量有關冷戰的組織及其相關活動檔案，但惟獨沒有收錄這兩個為香港和亞洲不少國家青年學生提供思想訓練的組織資料。當然，香港本地的檔案館同樣沒有收錄這兩個組織的資料檔案。職是之故，從參與這些組織活動的香港青年學生散布於校園報刊的文字中，反過來正好是補充了檔案研究的不足。

其都市功能也漸次突顯。據論者研究，美國在 1950 年代開始通過援助中國知識分子委員會 (Aid Refugee Chinese Intellectuals, Inc) 和亞洲基金會 (The Asia Foundation, 簡稱 TAF) 等組織，推動一間反共的中文高等教育機構為其冷戰工作服務；¹¹ 在眾多高校中，新亞書院就是這樣一所被鎖定為可用以發展為反共的中文高等院校，美國情治機構對之部署相關工作、投入大量資金與駐校人力安排。1953 年，錢穆 (1895-1990) 在其學生的夫婿引介下，開始接受亞洲基金會的援助，由此成立了新亞研究所。同時，獲得資助的還有崇基學院及聯合書院等相對較為成功的私立專上院校。錢穆在晚年的回憶中，提及後來與新亞書院一起組成香港中文大學的這兩家私專，大家都在辦校財政上得力於「美國方面的資助」，崇基得諸美國教會資助，聯合則「乃由亞洲基金會出資，集合其他私立學院中之五所組成」。¹²

1960 年，洛克菲勒基金會 (Rockefeller Foundation) 還給予新亞書院為期兩年、額度為美元 47,500 的資助，用於中國國學和中國研究。¹³ 1961 年至 1962 年，亞洲基金會續給予新亞港幣 83,400 元，鼓勵新亞開展更多與現實社會結合的研究工作及開辦反映當代中國局勢發展的課程。¹⁴ 除了獲得美國資助辦校外，新亞師生參與創刊、主持或主要投稿的刊物如《民主評論》、《中國學生周報》、《人生》、《祖

¹¹ Roberts, "Cold War Hong Kong Juggling Opposing Forces and Identities," 26-59. 類似關於援助知識分子委員會的研究，見 Glen Peterson, "Crisis and Opportunity: The Work of Aid Refugee Chinese Intellectuals (ARCI) in Hong Kong and Beyond," in *Hong Kong in the Cold War*, eds. Priscilla Roberts and John M. Carroll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41-158。

¹² 錢穆：〈新亞書院（續一）〉，收於錢穆：《八十憶雙親·師友雜憶》（臺北：東大，1983 年），頁 280。

¹³ 周愛靈：《花果飄零：冷戰時期殖民地的新亞書院》，頁 230-231。

¹⁴ Letter, Mallory-Browne to Qian Mu, 25 October 1961, AF P-171. Cited from Grace Ai-Ling Chou, *Confucianism, Colonialism, and the Cold War: Chinese Cultural Education at Hong Kong's New Asia College, 1949-63* (Leiden; Boston: Brill, 2012), 179.

國》等等都獲得美國機構的援助而得以經營下去。¹⁵

總之，在新亞未被併入成爲香港中文大學之前，先後獲得美國亞洲協會（Asia Society）、美國哈佛燕京學社（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洛克菲勒基金會、香港孟氏基金會（Mencius Foundation）、美國福特基金會（Ford Foundation）及美國雅禮協會（Yale-China Association）等國際機構資助。根據黃庭康的研究，1950年代，美國福特基金會就出巨資美元25萬資助新亞在農圃道建設新校園。黃庭康還進一步指出：就成立中文大學一事負責向港府遊說的組織，中文專上學校協會（Chinese Colleges Joint Council），其經費的一半都由美國亞洲基金會資助。¹⁶但是，本文先作說明的是，香港中文大學是由數所南下學人創辦的私專聯合組成，私專學人在港辦學是有其本身爲中國歷史文化傳承而辦教育的目的，反共不一定是他們的最主要目的；外來資助嚴格來說是他們在固有的學術、文教事業已經開展的基礎上給予了幫助，讓他們獲得資源及空間繼續他們自己手上原本已在進行的文教工作。這些文教工作或多或少都會影響湧進香港的百萬新移民中的年輕一代對於民主中國與共產中國的看法，甚至影響新一代對於美國的觀感。在冷戰年代，資助者與受助者彼此之間的合作大抵上可以說是各得其所、各取所需。¹⁷

爲了應對「共產主義」，香港中文高等院校的辦學者和學生與英美是一種協作關係。不過正如周愛靈在研究英國殖民地政府與新亞書院的協作時指出的：雙方存在著「同床異夢」的認知差異。¹⁸在研究美方與香港中文高等院校的這種「協作共謀」時，也需要注意到批

¹⁵ 錢穆：〈新亞書院（續一）〉，頁266-267。

¹⁶ B. P. Schoyer, Treasurer, Chinese Colleges Joint Council, to Director of Education, 21 November 1961, HKRS-147-3-14.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14 April 1959. Cited from Ting-Hong Wong, *Hegemonies Compared: State Formation and Chinese School Politics in Postwar Singapore and Hong Kong*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2002), 226-227.

¹⁷ 錢穆：〈新亞書院（續一）〉，頁264。

¹⁸ 周愛靈：《花果飄零：冷戰時期殖民地的新亞書院》，頁284。

判殖民的民族主義造成的受資助學人與學生在認知上與美方意圖的落差。¹⁹

從辦學者的角度看，正如區志堅〈非僅指的是吃苦奮鬥——從《新亞校刊》看五十年代「新亞精神」的實踐〉一文所說：辦學者如親國民政府的錢穆雖然需要藉助英人管治的香港來辦學，但卻因為香港殖民地氣氛十分濃厚之故，致使「錢穆並不滿意這種殖民地統治模式」。²⁰相反，這群南來的辦學者是懷抱十分強烈的文化民族主義思想來辦學，目的是要復興中國民族意識、中國歷史及傳統文化，並以樹立「民族自信為己任」。²¹

另一方面，從中文高等院校的學生角度看，在1960年代中後期，則又產生其獨特的對殖民思考的視角。在1980年代初曾任香港中文大學學生會會長的羅永生便曾分析道：

60年代的香港本身已經是百孔千瘡，在不思改革的殖民體制下，經濟縱有成長，但階級矛盾和社會危機卻一觸即發……60年代全球性的左翼運動是以超越美蘇的冷戰對立體制為基礎……香港的冷戰文化格局被徹底打破，並且讓右派主導的青年思潮向左大幅搖擺。²²

¹⁹ 在香港研究中，「協作共謀」這一概念的論述，可參見羅永生：《勾結共謀的殖民權力》（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15年）。

²⁰ 區志堅：〈非僅指的是吃苦奮鬥——從《新亞校刊》看五十年代「新亞精神」的實踐〉，收於鮑紹霖、黃兆強、區志堅主編：《北學南移：港臺文史哲溯源（文化卷）》（臺北：秀威資訊，2015年），頁243。

²¹ 區志堅：〈非僅指的是吃苦奮鬥——從《新亞校刊》看五十年代「新亞精神」的實踐〉，頁241。

²² 羅永生：〈「火紅年代」與香港左翼激進主義思潮〉，《二十一世紀》第16期（2017年6月），頁75-78。有關香港左派媒體對冷戰時期香港文化的影響，也可參考Yan Lu, “Limits to Propaganda: Hong Kong’s Leftist Media in the Cold War and Beyond,” in *The Cold War in Asia: The Battle for Hearts and Minds*, eds. Yangwen Zheng, Hong Liu, and Michael Szonyi (Leiden. Boston: Brill, 2010), 95-118。

羅永生在這篇文章中更進一步詳細分析了香港學生的各種左翼思潮，共計有「國粹派」、「托派」、「社會派」和「社會關懷」組織。²³ 羅永生雖認為「國粹派」雖是彎路，但也承認其主導地位，「托派」並沒有取得社運領導地位，而「社會派」也沒有國粹派的「龐大組織能力」。²⁴

除了「國粹派」的影響，羅永生在其另一本著作《殖民家國外》中還指出香港學生思潮「從右的民族主義轉移到左的民族主義」，當中的原因便是「香港人」這一身分認同的增強。香港學生強調對香港「當下具體生活社群」的關注，拒絕文化民族主義「宏大」而「離地」的論述；²⁵ 而在中文大學，「國粹派」則更是占據主導地位。2012年《中大學生報》刊登的反思60、70年代中文大學學運的文章也曾寫道：「而其時中大校內所有學生會和學生報皆由『國粹派』主政，被稱為『江山一片紅』，『國粹派』的支持者仍然較多，不論『社會派』及其他派別的學生一直以來如何與『國粹派』鬥爭，亦擺脫不了左傾的主流。」²⁶

綜合上言，無論是偏右的文化民族主義還是左傾的民族主義，都使得香港的辦學者和學生對美國的援助產生的認知不可能完全按照美方的意圖開展，更何況一些中文高等院校的學者與學生在左翼思潮影響下，更加難免從自身的思想關注熱點及其所處身的殖民地現狀出發進行時政思考。本文希望進一步指出的是，香港作為一個國際城市，居住其中的人在政治認知或身分認同上並非任何一方可以主導，而是多種思潮交纏互滲的影響產物，美方的原初意圖與在地認知的落差正是香港多元、複雜及曖昧性的體現，本文之所以強調這種落差，也是

²³ 據羅永生的研究，「國粹派」的主張是「直接學習和發揚文革中的『社會主義新生事物』」、「托派」信奉托洛茨基主義、「社會派」著眼香港本地改革、「社會關懷」組織則強調要以基督教和天主教理念為依託。羅永生：〈「火紅年代」與香港左翼激進主義思潮〉，頁80、82。

²⁴ 羅永生：〈「火紅年代」與香港左翼激進主義思潮〉，頁80、82。

²⁵ 羅永生：《殖民家國外》（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14年），頁84-87。

²⁶ Jaco：〈原來當年的學運是這麼的一回事〉，《中大學生報》2012年迎新特刊，轉載自《中大學生報》網站，<http://cusp.hk/?p=2830> 中大學生報，檢索日期：2019年5月5日。

爲了避免現有研究中忽視香港在地語境、解讀過於簡單化的問題。

從以冷戰爲背景觀察南來學者在港興學施教的過程中，研究南來學者在面對資源困乏情境下接受外來援助的情況，不但有助於理解香港教育史的多元面貌，也讓我們得以理解美國如何利用香港這個開放而各種勢力相互交鋒共存的獨特地方來推動其東亞地區的冷戰策略。眾所周知的是，教育是各種思想培育、精神滋長的溫床，同時也是冷戰時期各種意識型態競爭的戰線。由此一領域展開的研究，將能體現香港如何地作爲冷戰亞洲的美國情報中心。然而，發動全球冷戰的美國，因爲港府《教育條例》中不准在學校進行政治活動的限制，故不能在香港大張旗鼓地推行其反共計劃，只能以政治色彩較弱的方式進入校園來動員香港在地知識社群，透過上述所言的資助各種文化發展，進行心理戰以贏取文化冷戰戰局上的勝利，實現其圍堵共產中國以及打擊全球共產主義的目的。²⁷

根據美國中央情報局（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中情局）檔案顯示，美國自 1950 年代初開始，即成立心理戰委員會（Psychological Strategy Board），²⁸ 把教育納入其心理戰的重要環節。1951 年的中情局機

²⁷ 此處說美國交流活動的政治色彩較弱，是相較於國共這兩大在港政治勢力的活動方式而言。國共兩黨在港教育界的活動，都公開宣揚政治效忠意識，國民黨影響的學校懸掛青天白日旗，國民黨的學生交流活動，據港府政治部的調查顯示，自 1959 年開始，以「海外學生暑期回國觀光團」的名義，安排香港專上書院的學生前往臺灣接受反共政治教育與准軍事化訓練，之後返回香港爲國民黨工作。而共產黨影響的學校則會懸掛五星紅旗，慶祝「十一」，並以在學校中建立「革命小組」的形式或成立「鬥委會」的形式展開。國共兩黨因其在院校公開的政治活動，招致港府依據《教育條例》多次干預。美國在港的文化交流活動，則不存在類似國共這樣帶有強烈政治色彩的情況。有關國民黨的情況見 Extract from Hong Kong Police Special Branch Report. Origin on FED 62/402/01, CO1030/1605；有關共產黨的情況見吳康民口述，方銳敏整理：《吳康民口述歷史：香港政治與愛國教育（1947-2011）》（香港：三聯書店，2011 年），頁 59-77。〈九龍愛國教師集會組織起來鬥港英通過決議堅決響應各界鬥委會的號召〉，《大公報》第 1 張第 3 版，1967 年 5 月 29 日。〈港九學生界歡迎新界學生組成鬥委會，反帝隊伍壯大〉，《大公報》第 1 張第 3 版，1967 年 6 月 10 日。

²⁸ Chronology of the 40 Committee, LOC-HAK-331-4-24-3, CIA Library.

密文件將學生交換和邀請外國人員訪問列為影響共產國家的行動。在文件中，也明確將媒體、電臺、出版物稱為實施心理戰的政治類武器，將書籍、海報、電影稱為心理戰的冷戰武器（Cold War Weapons）。²⁹

根據現存的政府檔案、香港華文報紙以及學校刊物顯示，美國在香港高等教育領域展開的行動主要由一些非政府基金會、美國文化機構和香港美國新聞處執行，行動五花八門。本文現階段將集中於學生活動來探討這些機構如何與香港高校——特別是在辦學方面相對成功以及影響力較大的新亞書院為中心，探討它們在該校中所推動的活動。這些活動主要分為教育交換計劃、在讀學生課外生活的影響和舉辦研討會等等。以上這些活動內容，我們均可將之歸納為組成心理戰戰線的一環。

二、美國的交流計劃及香港師生的離港考察

交流計劃是指美國邀請香港在讀學生或院校學人前往美國高校交流，同時也包括美國人員來港交流的項目。據美國國務院（The State Department）第十二次有關國際教育交流項目的「半年度報告」，基於富布萊特計劃（The Fulbright Program）³⁰等項目的美國國際教育交流

²⁹ Special Task Assignment for PSB (Inventory of Cold War Weapons), 24 September 1951, CIA-RDP80-01065A000400070028-7.

³⁰ 富布萊特（J. William Fulbright, 1905-1995）計劃本來是為初級教育和中學教育的教師提供國際交流的機會，緣起於1946年英國外交部（Foreign Office）邀請和美國國務院成立的一個委員會，促進美國與英國之間的教師交流。這一項目在美國國會的第七十九屆國會第五百八十四號公共法富布萊特法案（The Fulbright Act Public Law 584, 79th Congress）和剩餘資產法案（The Surplus Property Act of 1944）授權下，授權總統動用外匯資助教育交換計劃。學界關於教育交流與文化冷戰的中文研究也大部分集中於富布萊特計劃，在宏觀的戰略定位層面已有一定的研究成果，但本文則將探討富布萊特計劃以外被忽視的其他教育冷戰活動。富布萊特的相關研究見崔建立：《冷戰時期富布萊特項目與美國文化外交》（長春：東北師範大學，2011年）。崔建立：〈富布萊特項目對我國國際文化教育交流的啟示〉，《東北師大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1年第250期，頁187-191。

項目是爲了「增加對民主制度和美國生活方式的信心，通過個人與個人的直接體驗來加強自由世界安全的基礎，應對國際共產主義對民主的衝擊」。³¹

美國在戰後展示其國力以至在冷戰時期在香港資助文教機構進行人員互訪，並不純然是出於教育目的，乃有其藉此達至宣揚美國價值的目的。「半年度報告」十分清楚地告訴我們一個與目前學界成見不同的觀點——雖然美國整個戰後重建政策無疑是以歐洲爲中心，但在文化冷戰、特別是國際教育交流上，遠東才是最重要的戰略區域。蓋其原因有二：第一，遠東是共產黨大本營所在，是意識形態戰爭要地，更急需發展思想宣傳工作；第二，該份材料基於列寧的「北京是到巴黎之路」論點，指出遠東的反美勢力強大並在持續增長，認爲遠東很可能成爲國際共產主義擴張、進而威脅歐洲的重要且危險的區域。³²

爲了有效應對共產主義的擴張，美國國務院也擴大其教育交流計劃，同時也注意與其他非政府組織或院校文化交流計劃合作以擴充影響力。譬如，國務院合作的對象便包括了美國戰地服務團（American

胡禮忠：〈富布萊特項目與中美教育交流〉，《國際觀察》2000年第5期，頁43-48。李聯明、汪霞：〈高等教育國際化進程中的美國「富布萊特計劃」評說〉，《河北師範大學學報》第8卷第6期（2006年11月），頁49-52。孫大廷、孫偉忠：〈美國高等教育國際化政策的文化輸出取向——以「富布賴特計劃」爲例〉，《黑龍江高教研究》2009年第181期，頁53-55。U. S. Department of Health Education and Welfare, Office of Education: *Exchange Teaching Abroad Under Public Law 584 79th Congress the Fulbright Act*.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Washington, 1953)。

³¹ “The 12th Semiannual Report of the International Educational Exchange Program of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transmitted to the Congress on March 22, 1954,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Bulletin* 30, no. 771, Publication 5420. CIA-RDP60-00442R000100140003-6, 5 April 1954, 499.

³² As Lenin once said: “the road to Paris is through Peking.” “The 12th Semiannual Report of the International Educational Exchange Program of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transmitted to the Congress on 22 March 1954,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Bulletin* 30, no. 771, Publication 5420. CIA-RDP60-00442R000100140003-6, 5 April 1954, 499.

Field Service)、四健會(National 4-H Club Foundation)、麻省理工學院暑期交流計劃(Foreign Student Summer Projects)和美國國家劇院(American Ballet Theatre)的交流項目。³³

美國國務院的教育交流項目在機構設置上，甚具規模和體系化，據上述的「半年度報告」顯示，截至1954年，富布萊特法案建議設立的合作機構分別有國際教育協會(The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美國教育辦公室(United States Office of Education)、全國福利會議(National Social Welfare Assembly)、政府事務研究所(Government Affairs Institute)、理事會聯席會議委員會(The Conference Board of Associated Research Councils)和美國教育委員會成(American Council on Education)。此外，富布萊特法案還設立華盛頓國際中心(Washington International Center)、美國語言中心(American Language Center)、散布於12所美國學院和大學的迎新中心(University Orientation Centers)、專為「國際生活實驗」受助對象提供服務的機構，使他們在赴美交流時獲得適切的語言、美國文化、歷史和生活方式的教育。為了讓受資助赴美的人一進入美國就能對美國產生良好印象，國務院還在紐約、邁阿密、新奧爾良、舊金山四地設立接待中心，負責機場接待、預訂住所、行程安排，幫助其與美國當地人建立聯繫，讓來訪者一抵步便對美國充滿好感。³⁴該份報告書未提及的是，美國為了塑造歡迎外國學生的形象，還設有外國留學生服務委員會(Foreign Student Service Council)。該機構雖然註明是私

³³ Cooperation with other exchange programs, "The 12th Semiannual Report of the International Educational Exchange Program of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transmitted to the Congress on 22 March 1954,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Bulletin* 30, no. 771, Publication 5420. CIA-RDP60-00442R000100140003-6, 5 April 1954, 502-505.

³⁴ "The 12th Semiannual Report of the International Educational Exchange Program of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transmitted to the Congress on 22 March 1954,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Bulletin* 30, no. 771, Publication 5420. CIA-RDP60-00442R000100140003-6, 5 April 1954, 507.

人機構，但可與時任總統的肯尼迪直接聯繫，商討大小合作事宜。這個委員會曾設立一個「外國學生日委員會」(Foreign Student Day Committee)，透過在全美各地設立節日的形式表達美方對外國學生的歡迎。³⁵以密歇根州為例，它便於1961年設立這個節日，其地區委員會(The District Commissioners)便邀請了美國總統出席節日慶典。³⁶

由上觀之，美國為教育交流花費了不少心思，款待環節十分細緻、周到，這無疑增強了情感感召力而有利於實現政治的影響力，影響交流者對於美國政治、文化的認知。除了邀請外國學生到訪美國，美國政府設立的交流項目也派員出訪國外的教育機構。富布萊特計劃指定的合作機構國際教育協會，早於1958年6月3日就派遣其外國留學生部負責人愛里爾夫人(Mrs. Eliel, ?-?)到訪新亞，商討教育事宜。³⁷1958年10月29日，美國富布萊特計劃核心人物美國參議員富布萊特更親訪新亞書院。他與新亞書院的創辦人錢穆商討教育問題，並盛贊新亞書院道：「假如人類有任何希望的話，其希望是寄託在新亞書院這類的學府」。³⁸

與新亞書院關係密切的香港第三勢力代表人物、中國民主社會黨少壯派領袖王厚生(?-?)於其創辦的《再生》雜誌所說的，美國於戰後為了維護民主及自由的核心價值而大舉援助外國，由此而作為對「美國安全之投資」。³⁹富布萊特的計劃便可以視作為這一外交國策的

³⁵ Mrs. Donaldson Ackerman Chairman of Foreign Student Day Committee to the President, the White House Washington, D.C., 3 November 1961, JFKPOF-101-003-p0032, John F. Kennedy Presidential Library and Museum.

³⁶ Section D. L.D. Battle, Executive Secretary, Subject: Presidential Meetings with Foreign Students, Memorandum for Mr. McGeorge Bundy the White House, 29 September 1961, 4. Folder Title: Education, JFKPOF-101-003-p0026, John F. Kennedy Presidential Library and Museum.

³⁷ 〈本院兩周大事〉，《新亞生活》第1卷第4期(1958年6月16日)，頁3。

³⁸ 《新亞生活》第1卷第13期(1958年11月24日)，頁3。〈大學教育的三種意義——羅維德博士在第十四次月會講詞〉，《新亞生活》第1卷第14期(1958年12月8日)，頁1。

³⁹ 王厚生：〈論以自助為基礎的美國外交政策〉，《再生》第258期(1950年1

精神體現。自富布萊特探訪新亞後的數天或數月內，美國多名軍政人員頻繁來校拜訪。以下略舉數例觀之：

「美海軍部包曼 (David Bowman) 訪問本院」(1958年12月9日)⁴⁰

「美國務院司代表班迪 (William Bundy) 訪問本院」(1958年12月10日)⁴¹

「美國駐越南大使館謝利 (John Sherry) 夫婦訪問本校」(1959年1月20日)⁴²

「美國駐關島海軍司令史肯納 (John Skinner) 與夫人來本院參觀」(1959年2月27日)⁴³

「美國參議員布什先生 (Prescott Bush) 訪問本校」(1959年11月20日)⁴⁴

「美國國務院中蘇關係研究顧問唐盛鎬博士訪問校長」(1959年12月3日)⁴⁵

「美國駐香港總領事 (Marshall Green) 伉儷來校訪問」(1963年3月16日)⁴⁶

月)，頁2。

⁴⁰ 〈本院三周大事〉，《新亞生活》第1卷第15期(1958年12月22日)，頁5。

⁴¹ 〈本院三周大事〉，頁5。

⁴² 〈本院五周大事 一月十二日至二月二十日〉，《新亞生活》第1卷第17期(1959年3月2日)，頁3。

⁴³ 〈本院兩周大事〉，《新亞生活》第1卷第18期(1959年3月16日)，頁2。

⁴⁴ 〈本校兩周大事記，1959年11月12日至11月30日〉，《新亞生活》第2卷第11期(1959年11月30日)，頁2。

⁴⁵ 〈本校兩周大事記〉，《新亞生活》第2卷第12期(1959年12月14日)，頁3。

⁴⁶ 〈本校大事記三月十一日——三月三十一日〉，《新亞生活》第5卷第19期(1963年4月19日)，頁3。

對於新亞這樣一所私專書院，美國官階不低的官員如此頻密登門訪問，反映美國對新亞書院重視有加。其他兩所私專也有類似情況，據崇基書院的校刊記載：

「本院六月六日下午二時舉行第一屆『運動日』，由教務長龐德明任主席，美新聞處處長柯約瑟氏演講。」（1957年6月6日）⁴⁷

「美國陸軍有功將領，現為美國著名銀行家霍白斯將軍（Hobbs）最近抵港考察。凌院長夫婦特邀其於四月十二日四時卅分蒞院參觀。」（1958年4月12日）⁴⁸

「美國領事館總領事葛端恩，文化部部長尼可氏，曾於五月十六日上午十時卅分蒞校訪問。」（1961年5月16日）⁴⁹

據聯合書院校刊記載：

「美國教育部 Robert Barendsen 訪問書院，書院向其展示未來北角新址的計劃。」（1960年3月3日）⁵⁰

「美國阿肯色州銀行家 Arthur MeLean 及其夫人應凌道揚邀請來訪，Arthur MeLean 是富布萊特議員的密友。」（1960年5月）⁵¹

「美國新聞處 Mr. Robert Tims 陪同適由美到港之美籍教授 Dr. & Mrs. C. L. Shaver 來校訪問校長。」（1960年8月16日）⁵²

「亞洲基金協會香港負責人邁勞布朗先生（Mr. W. Mallory-

⁴⁷ 〈校聞點滴〉，《崇基校刊》第11期（1957年7月），頁23。

⁴⁸ 〈校聞匯志〉，《崇基校刊》第15期（1958年5月），頁16。

⁴⁹ 〈校聞撮錄〉，《崇基校刊》第30期（1962年7月），頁27。

⁵⁰ *United Bulletin*, No.1, July 1960, 10.

⁵¹ 原文：“a personal friend of Senator J. William Fulbright.” 見“News And Events,” *United Bulletin* 1 (July 1960): 10。

⁵² 〈本校大事記一九六〇年八月至六一年一月〉，《聯合校刊》第2期（1961年4月），頁21。

Browne) 由美國領事館文化專員本校校長副校長學務長及高級講師數人陪同到建校地址參觀。」(1961年6月7日)⁵³

「美國新聞局為明瞭亞洲各地大學語言教育，特派語言專家華士路斯基分赴遠東各地考察。今日上午十一時特蒞校訪問。」(1962年12月18日)⁵⁴

「美國駐港總領事葛瑞恩先生 Mr. Marshall Green，同文化專員倪軻士先生 Mr. R. L. Nichols，今早十時，聯袂蒞臨。」(1963年6月19日)⁵⁵

美國派遣人員開展交流的目的，可從亞洲基金會會長布魯姆 (Robert Blum, 1954至1962年任會長) 在1961年發表的一篇名為〈國際學生交換——亞洲人士的觀念與美國應負的責任〉看出。他在文章中詳細闡釋了該機構的日常工作，特別強調美國想要實現的交流不能好像蘇聯那樣，表面大搞宣傳，實質上實行隔離政策。相反，美國要推行的是在地的、平易近人的交流方式，讓亞洲學生感受到他們與美國學生在交流過程中彼此是平等互待的。在夏威夷大學設立的「東西文化技術交流中心」就是為了要發揮這一交流功能而設立的機構。他談到美國要具體實現的目標時，很清晰指出亞洲基金會所支持的國際學生交換計劃，必須得有助於建立美國與外國間的友好關係。他強調不論是為替美國與其他國家建立友情，還是為團結反共的力量，又或者是協助外國學生增加學識和技能以便他們將來回國貢獻國家，最終目的都是要能夠增進美國與他們國家的友情。基金會的另一重要工作是讓外國學生能夠對美國產生長遠的好感，並讓他們在留

⁵³ 〈本校大事記 一九六一年三月至一九六二年一月〉，《聯合校刊》第3期 (1962年1月)，頁17。

⁵⁴ 〈本校日誌〉，《聯合校刊》第6期 (1963年3月)，頁14。

⁵⁵ 〈本校日誌〉，《聯合校刊》第7期 (1963年7月)，頁6。

美期間深刻體驗美國的民主制度。⁵⁶

布魯姆在文章中不斷強調稱，美國教育外國學生的最高目標是要讓他們重視自由社會的原則，讓他們在美國學得一技之長，回國後貢獻他們的國家社會。綜合上述所言，亞洲基金會是美國建立國家形象的重要工程，在全球構造以美國為中心的反共聯盟的文化交流機構，在全球範圍內培植未來可與美國合作的當地菁英。明白了亞洲基金會的職能及美國的國家戰略目的之後，我們才能更立體地或者是更深刻地瞭解到該基金會對香港高校的資助或者是津貼青年學生赴美交流，不會是那麼單純的一種慈善工作或學術活動。⁵⁷

美國總統肯尼迪的特別助理及歷史學者小亞瑟·史列辛格 (Arthur Schlesinger, 1917-2007) 曾在一份提交給肯尼迪總統關於接收外國學生問題的備忘錄中，十分重視要接受外國學生以及培養青年領袖的工作。他認為：「百分之五十五的世界人口是年齡低於二十五歲的年輕人，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低於二十五歲的年輕人則要占到百分之六十。」他指出在未來這個屬於年輕人的時代裡，要抓住機會讓外國年輕人認識自由開放的美國，並讓他們準備好承擔宣揚自由價值的責任。⁵⁸

⁵⁶ 布魯姆：〈國際學生交換——亞洲人士的觀念與美國應負的責任〉，《大學生活》第7卷第9期（1961年9月16日），頁11-13。（布魯姆曾任美國國防部長助理，他也先後在駐法經援會〔Economic Cooperation Administration to France〕，駐東寮越技術經濟援助會、駐歐特別辦事處以及總統府國際新聞委員會等政府部門供職。）

⁵⁷ 相關研究，可再參考目前學界不少針對美國中情局或美國新聞處撥款給香港一些出版社以進行反共文學創作的計劃的論述。請見王梅香：〈文學、權力與冷戰時期美國在臺港的文學宣傳（1950-1962年）〉，《臺灣社會學刊》，2015年第57期，頁1-51。香港電影與冷戰的關係則可參看吳國坤 (Kenny Ng) 的著作，見吳國坤：〈冷戰時期香港電影的政治審查〉，收於黃愛玲、李培德編：《冷戰與香港電影》（香港：香港電影資料館，2009年），頁53-69；吳國坤：〈以影犯禁：冷戰，瘟疫，諜戰〉，《中國文學學報》2011年第2期，頁313-326。

⁵⁸ Arthur Schlesinger, Jr. Memorandum for the President, Subject: Reception for Foreign Students. 8 May 1963, Folder Title: Education, JFKPOF-101-003-p0059,

基於上述的認識，我們對於美國專為香港高校舉辦的各種交流活動，有理由將之看作是美國展開文化冷戰的其中一個組成內容。相關官員或法案人員頻繁來港進校訪問，應該也不只是進行純粹的觀光或學術交流。

1960年，專責香港情報工作的美國新聞處官員與新亞書院的交往同樣值得我們關注。新亞高層應邀參加美新處專員蒂姆斯（Robert Tims，?-?）舉辦的雞尾酒招待會，這名專員也帶領了美國史墨法案（Smith-Mundt Act）項目人員沙佛（Dr. Clauder L. Shaver，?-?）訪問新亞。美新處處長或文化事務官離任，新亞書院為之舉辦歡送禮。⁵⁹新亞也把美新處威爾遜（Earl Wilson，?-?）與副處長斯瑞克（Gerald Stryker，?-?）訪問新亞視作一周中的大事報導一番。⁶⁰1960年代初到訪新亞書院的還有美新處文化專員尼古拉斯（Robert L. Nichols，?-?）、⁶¹助理文化事務普賴斯（D. R. Price，?-?）、⁶²助理文化事務官托爾曼（Norman H. Tolman，?-?）、⁶³文化組主任費爾曼（英文名不詳，?-?）等等。⁶⁴

新亞每次對外發布的公開文稿，均將美國情報部門之要員來訪看作是校中大事。美國駐港或訪港的政界要員如此頻密地訪問新亞，不論是從當時或今天來看，都應該不是偶然的。如果我們接受上述美國情治部門對「冷戰武器」所作的定義，那麼，我們也不得不把這樣頻繁的探訪看作是美方非一般的禮儀拜訪，應是美國政府各種交流計劃下具戰略性目的的冷戰項目活動。

JFKPOF-101-003-p0060, John F. Kennedy Presidential Library and Museum. 1-2.

⁵⁹ 「美國新聞處文化事務官倪軻士先生經已卸任，特來校辭行；並介紹新任文化事務官李德先生。」《新亞生活》第3卷第17期（1961年4月24日），頁5；《新亞生活》第8卷第8期（1965年11月5日），頁7。

⁶⁰ 《新亞生活》第4卷第12期（1962年1月13日），頁2。

⁶¹ 《新亞生活》第6卷第11期（1963年11月15日），頁3。

⁶² 《新亞生活》第9卷第2期（1966年6月10日），頁7。

⁶³ 《新亞生活》第10卷第6期（1967年10月13日），頁15。

⁶⁴ 《新亞生活》第11卷第5期（1968年9月9日），頁8。

新亞書院在其發展到加入中大的過程中都有美方派到香港交流人員的幫助。譬如雅禮協會會定期派遣美國教員作為交換教員到新亞任教，進行教學工作。在眾多美國來港出任新亞教學工作的人員當中，最值得我們注意的就是推動新亞合併成為中文大學一份子的蕭約（B. Preston Schoyer, 1911-1978）。1951年，蕭約出任雅禮協會在新亞的臨時代表，這一代表職位同時在新亞亦享有校董的身分，蕭約之後幫助在新亞任英文教師的郎家恆牧師（Charles H. Long, 1954年至1958年任雅禮駐新亞代表，?-?）發展雅禮與新亞的合作事務。蕭約1959年起正式擔任雅禮駐新亞代表，一直到1967年。在中文大學籌備階段，蕭約出任臨時校董會的委員、新亞審計長。中大正式成立後，他擔任新亞副校長以及中大校董。不難發現的是，不論是從1951年至1959年這九年新亞的草創發展期，還是1959年至1967年新亞逐漸成為中大一部分和邁向國際化的發展階段，蕭約都是新亞和中大的實權掌握者，他對新亞院務財政更擁有最大的決定權。⁶⁵吸引我們注意的還有，蕭約本人具有清晰的美國軍方背景，他曾於二戰中任職美國空軍，更因為戰功彪炳而獲得榮譽勳章。⁶⁶

崇基書院在與美國的高等教育上亦多有合作。據《崇基校刊》記載，美國新澤西普林斯頓教育考試服務處主辦的美國大學入學考試，多年來都是由崇基主持。⁶⁷再具體到學生交換計劃，崇基與加州的赤域大學（University of Redlands，亦譯作雷德蘭茲大學）建立交換學生計劃。⁶⁸赤域大學創立於1909年，是一所私立浸信會大學。崇基與

⁶⁵ 陳方正：〈自來積毀骨能銷——錢穆離開新亞之謎〉，收於陳方正：《用廬憶舊》（廣東：廣東人民出版社，2016年），頁249。

⁶⁶ 耀童：〈新任雅禮協會代表 蕭約先生簡介〉，《新亞生活》第2卷第6期（1959年9月21日），頁8。展：〈新亞書院與雅禮協會合作經過參考資料〉，《新亞生活》第13卷第15第16期合刊（1971年2月10日），頁9-10。B. Preston Schoyer, “Memories of New Asia,” 《新亞生活》第13卷第15第16期合刊（1971年2月10日），頁26-28。

⁶⁷ 〈校聞剪輯〉，《崇基校刊》第35期（1964年4月），頁19。

⁶⁸ 〈系會及社團動態〉，《崇基校刊》第27期（1960年7月），頁22。

該校互派一名學生前往對方學校進行為期一年的學習體驗。崇基的交換生遴選程序是由崇基海外學生委員會負責。赤域大學則設有香港委員會，負責赤域大學與崇基的交換學生計劃。赤域大學還設有「國際學生組織」，該組織在1965年改為「國際友誼圈」(International Friendship Circle)，組織的外國學生顧問一般由赤大註冊主任兼任，通過舉辦聚會的形式，溝通美國學校與非美國本地學生的關係。據崇基校方資料顯示，赤域大學與崇基學院在1959年至1965年間互派多名交換生往返香港、美國留學。如1960年，赤大就派出三年級學生岳馬榮(Marvin Ott, ?-?)入讀崇基史地系，崇基化學系二年級女學生葉小梅則入讀赤域大學化學系三年級繼續專業課程。⁶⁹

崇基與加州的赤域大學的交換計劃讓參加者開了不少眼界。據崇基學生葉小梅撰寫的回憶文章顯示，赤域大學讓她認識到了美國在衣食住行上的現代化與優越性，也讓她了解到美國青年男女的開放觀念。但令她印象最深刻的是該校學生對政治的興趣和學生團體，她特別記述到學生們對於政治具有相當濃厚的興趣，他們可以自由談論各種政體、或擁護某種自己喜愛的政團，如青年民主黨或青年共和黨之類的組織，凡有興趣者均可加入作為會員，不會受到任何阻礙或威脅。⁷⁰這給在香港長大的葉小梅帶來觀念上的新衝擊。

另一名崇基學生陳國存於其回憶文章中亦有專章談論赤域大學的學生團體，他較關注該校學生會的選舉流程、學生週會和學生報出版事宜。對於學生會所高舉的民主自由精神發出由衷讚嘆，使其體認到

⁶⁹ 據赤域大學校友通訊 *OchTamale* 記載，Marvin Ott 在專門培訓軍官的美國國防大學(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國家戰爭學院(National War College) 任教，直至2011年退休。亦在伍德羅·威爾遜國際學者中心(Woodrow Wilson Center) 擔任公共政策研究學者，他獲美國國防部頒授聯合公職獎章(Joint Civilian Service Commendation Medal)。 *OchTamale: News for Alumni & Friends of the University of Redlands* 87 no. 3, 2011, 30. 《崇基校刊》1第28期(1961年10月)，頁21。

⁷⁰ 葉小梅：〈從赤域說起〉，《崇基校刊》第31期(1962年10月)，頁12、17。

學生組織的存在正是體現大學民主及自治精神的標誌。⁷¹ 聯合書院於 1967 年派赴美國印第安納大學交換的學生陳永洸 (?-?)，他對美國學生的政治熱情也印象深刻，總結出許多國家政府反對學生談政治的做法是錯誤的看法。⁷²

中文大學成立後，三所成員書院新亞、崇基和聯合在首任校長李卓敏 (1912-1991) 的安排下，進一步加強與美國的交流互動。中文大學除了有受富布萊特資助的學者來校擔任客座講師之外，⁷³ 更大的一項交流是 1965 年與加州大學簽訂的學生交換計劃。根據港英政府檔案裡一份資料顯示，首任香港中文大學校長李卓敏在創校之初便要改變中文大學的辦學使命，準備把崇基、新亞與聯合三所書院重新整合——把英式大學轉型至美式大學教育模式。他由此而一手促成中大與美國加州大學的學生互換計劃。⁷⁴

李卓敏本人是加州大學畢業生，他在該校出任教授前曾經在 1940 年代中期出任國民政府行政院善後救濟總署副署長，聯署總署長是美軍將領魯克斯 (Lowell Ward Rooks, 1893-1973)。⁷⁵ 李氏於 1951 年赴美出任其母校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的中國研究所所長，專研中國共產黨的政治與經濟問題。由他所主導的加州大學與中文大學的交換計劃，在形式上是中文大學與對方每年簽訂為期一年的交換協議，然後逐年續約。中大校方於校內設立加州大學學生輔導處，作為專職統籌機構，加州大學更是直接派遣一眾極為資深的中國研究專

⁷¹ 陳國存：〈赤域之憶想〉，《崇基校刊》第 37 期 (1965 年 1 月)，頁 26。

⁷² 〈本院續與海外大學 建立學術合作關係〉，《聯合校刊》第 16 期 (1968 年 1 月)，頁 4。陳永洸：〈海外歸鴻之二〉，《聯合校刊》第 17 期 (1968 年 8 月)，頁 39-40。

⁷³ 〈學人行蹤〉，《中文大學校刊》第 4 卷第 11 期 (1968 年 8 月)，頁 7。

⁷⁴ *Note of a Meeting between Sir A. Cohen and Dr. Li Choh-Ming (Vice-Chancellor of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at the D.T.C on 28 January 1964, CO 1030/1535.*

⁷⁵ 〈行總舞弊案，李卓敏等九名下不起訴處分〉，《華僑日報》第 1 張第 1 頁，1947 年 12 月 20 日。

家出任機構主管。譬如於 1968 年中旬出任主管的石雅壽 (H. Arthur Steiner, 1905-1991)，⁷⁶ 他於 1931 年便開始就於洛杉磯加州大學講授政治學，並兩度出任政治系系主任。他擔任中大輔導處主任時，身兼美國政治學會、亞洲研究學會和美國國際公法學會等眾多重要學會會員。1937 年以來，石雅壽三度訪問中國，在 1948 年至 1949 年，更以富布萊特學者身分訪問南京。⁷⁷ 他隨後主要負責美國的中國研究。⁷⁸ 結合這個機構十數年間來港工作的美方人員背景觀之，不難發現學生輔導處裡的主管級人員都是美國學界的當世著名學者，並且多是在一些對華情治工作基金會資助下來港工作的人。

1965 年至 1969 年，加州大學到中大交換的學生共計有 30 名。⁷⁹ 在 1969 年至 1970 年，加州大學有 16 名學生在中大交流，其中 3 名洛杉磯分校的研究生是由美國國務院資助來中大交換的。這些交換活動也令美國學生能有機會與香港學生溝通，進一步了解香港中文大學學生的社會政治認知。如 1966 年至 1967 年參與交換計劃的加州大學聖芭芭拉分校博士生霍德禮 (Steve Hoadley, ?-?)，他在交換期間也任中文大學高級研究員，曾於《崇基校刊》發表文章，分析崇基學生的政治取向，並評估崇基學生於未來香港社會政治領域可能發揮的作用。霍德禮的第一個調查是讓崇基學生評價香港各種功能團體對政府政策的影響力，得出的結果是崇基學生認為大公司和警察的影響力較小，而新聞和工會的影響力較大，霍德禮認為這反映出香港嚮往自由的年輕人的一種理想主義。霍德禮的第二個調查是讓學生回答「誰最

⁷⁶ 〈聘任事項〉，《中文大學校刊》第 4 卷第 10 期 (1968 年 7 月)，頁 2。

⁷⁷ 〈大學新聞〉，《崇基校刊》第 46 期 (1969 年 6 月)，頁 47-48。

⁷⁸ The Committee on Scholarly Communication with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 Relationship Restored: Trends in U.S.-China Educational Exchanges, 1978-1984* (Washington D.C.: National Academy Press, 1986), 20.

⁷⁹ 〈學生活動〉，《崇基校刊》第 41 期 (1966 年 12 月)，頁 46；〈大學新聞〉，《崇基校刊》第 43 期 (1967 年 12 月)，頁 49；〈大學新聞〉，《崇基校刊》第 46 期 (1969 年 6 月)，頁 47；〈大學新聞〉，《崇基校刊》第 47 期 (1969 年 12 月)，頁 18。

有助於讓香港變成一個更好的城市」，得出的結果是崇基學生普遍認為與政府相關的人員更有幫助，霍德禮認為這反映出學生對政府的尊重。霍德禮的第三個調查針對的是崇基學生對政府選舉的看法，在市政局的選舉上，只有百分之二十五的學生不樂意參加選舉，在立法會的選舉上，百分之七十四的學生認為每個香港人都有權投票決定，而不是由立法會或港督指定的部分富人或受教育的人決定。霍德禮認為這些都反應了學生對民主制度的尊崇之情。⁸⁰

除了上述與加州大學的交換計劃外，還有針對學生領袖培訓的交流計劃。如 1965 年，新亞學生陳勝長參加美國國務院「遠東學生領袖計劃」，在美國遊歷 68 天，期間通過於美國家庭體驗生活、訪問學校、與美國政要會談等深入認識美國文化。⁸¹ 這個計劃是由美國國務院主導，並交由「國際生活實驗」這個組織執行。這個組織於 1932 年由華特 (Donald B. Watt, ?-?) 創立，組織的總部設於美國佛蒙特州，組織相信只有讓參與者在交流過程中，感覺到彼此是親如家人，這樣方能更好地理解彼此的文化。⁸²

從陳勝長筆下所記述的內容，大致上可以瞭解到他那次出外交流活動的情況。他記述了活動主辦方雖然多次聲稱是文化活動而非政治性活動，但相關活動確實涉及不少政治參訪活動。他作為香港代表，與南韓、日本、臺灣、菲律賓、馬來西亞、澳洲、新西蘭的代表一起從檀香山出發、自西向東遊覽了舊金山、西雅圖、芝加哥、波士頓、

⁸⁰ Steve Hoadley, "Potential Political Participants?" *Chung Chi Bulletin*, No.43, December 1967, 43-44. "Exchange Agreement Renewed," *Chinese University Bulletin* 2, no. 9 (April 1966): 1. (Steve Hoadley 在加州大學聖芭芭拉分校獲得政治科學博士，曾在美國海軍服役。他後來於新西蘭的新西蘭國防軍指揮參謀學院擔任榮譽教授，為新西蘭國防軍政人員授課。此外，他還服務於新西蘭富布萊特委員會、太平洋經濟合作理事會新西蘭委員會和印太安全合作理事會等重要國際組織。)

⁸¹ 陳勝長：〈美國六十八日〉，《新亞生活》第 8 卷第 3 期（1965 年 6 月 18 日），頁 6。

⁸² 馬金順：〈美國七十日〉，《聯合學生》第 5 號第 2 版，1966 年 4 月。

紐約、華盛頓和洛杉磯等美國重要城市。在西雅圖期間，由美國當地的國務院人員接待，為各區域代表安排家庭體驗活動。⁸³此外，陳勝長與其他代表亦參觀了美國國務院、五角大樓和負責全球文化交流戰略的部門亞洲協會。⁸⁴在參觀美國國務院時，陳勝長獲得著名美國政治家、外交家哈里曼（William Averell Harriman，1891-1986）接見，並與國務院其他職員進行長時間的個別會談。而在參觀五角大樓國防部時，美方人員安排陳勝長一行觀看介紹美國軍備的電影，該電影宣揚了美國武備建設是為了防衛世界和平之用。參觀完五角大樓後，他們又得以參觀國會大樓，面見國會議員。他聽取了議員們對南越問題的議論，並記述下議員們發表了「不讓東南亞變成共產世界」、「美軍繼續作戰維護和平」之類的講話。⁸⁵

除了新亞書院，崇基書院學生領袖吳白弢參加了1964年的「遠東學生領袖計劃」，聯合書院學生會秘書馬金順、學生殷巧兒與顧爾言則分別參加了1966年、1967年和1968年舉辦的「遠東學生領袖計劃」。據顧爾言記述，「遠東學生領袖計劃」在60年代末已經形成固定流程，每年舉辦三次，每次邀請十幾位遠東地區的學生代表進行為期70天的訪美活動，具體行程由「國際生活實驗」計劃安排。第一站多是夏威夷的檀香山，會在該校出席東西文化中心舉行的討論會，之後通常是遊覽美國各大城市（由十數個至二十多個不等），訪問大學，會晤學生領袖，大學教授、社會領袖或政要，參觀諸如聯合國、國際商業機器股份有限公司（IBM）和美國全國學生聯會、白宮、參

⁸³ 陳勝長：〈美國六十八日〉，《新亞生活》第8卷第3期（1965年6月18日），頁6。

⁸⁴ 陳勝長：〈美國六十八日〉，《新亞生活》第8卷第17期（1966年4月1日），頁13-14。

⁸⁵ 哈里曼曾獲提名競逐民主黨總統候選人、先後出任多國大使，並歷任美國商務部部長、紐約州州長、主管亞洲事務助理國務卿以及國務次卿等要職。他在接見陳勝長等人時正身任總統特命的巡回大使（Ambassador-at-Large）。陳勝長：〈美國六十八日〉，《新亞生活》第9卷第3期（1966年6月24日），頁14-15。

議院和國會等政商學據點，⁸⁶ 參加各種的會議和研討會，討論時事，關注學生運動及美國社會問題等等。⁸⁷ 通常「國際生活實驗」會安排美國家庭體驗與學校體驗的活動。譬如後來出任中大安保主管的馬金順入住的美國家庭對馬金順便關懷備至，為其購置手襪、雪靴等物品，讓馬金順體驗到美國社會的溫情。⁸⁸ 但馬金順還是注意到，因為越戰緣故，美國對中國人的印象不佳——「美國人一提到中共或中國便咬牙切齒」。⁸⁹ 曾任職香港中文大學入學及學生資助處處長的陳文琬在其記述中則提及她獲得美國副總統接見，美國之行令她「與不同文化背景的學生接觸」，讓她「學會以更多元的思維對待事物」，在美國家庭的寄宿經歷更影響了她在未來的職業選擇。⁹⁰ 這些計劃還有一些共同的目的，就是讓參與者學習美國大學的「學生組織、會議、上課、出版文化」，讓亞洲學生的領袖了解到美國學生生活中的民主進程，更好地了解美國大學系統和美國學生領袖的價值觀。⁹¹

美國國務院除了舉辦「遠東學生領袖計劃」外，還曾舉辦「東南亞區學生領袖計劃」和「東亞及太平洋學生領袖計劃」等培養學生領袖的交流活動。這些活動也是由國務院邀請、並由「國際生活實驗」安排在美國的行程。新亞書院中文系二年級學生黎鳳慧於1966年參加「東南亞區學生領袖計劃」，考察美國文化與制度。⁹² 另一名新亞學

⁸⁶ Richard MA Kam-shun, English Secretary, Students' Union, United College, "A Student Leader's Visit to the United States," *United Bulletin*, No.13, May 1966, 17-18.

⁸⁷ 〈殷巧兒赴美訪問——出席遠東學生領袖研討會〉，《聯合學生》第9號第1版，1966年8月。〈殷巧兒出席第十屆遠東學生領袖觀摩會〉，《聯合校刊》第15期（1967年7月），頁42。〈陳文琬、顧爾言先後出席遠東學生領袖觀摩大會〉，《聯合校刊》第17期（1968年8月），頁40。

⁸⁸ 馬金順：〈海外來鴻〉，《聯合學生》第3號第1版，1966年2月。

⁸⁹ 馬金順：〈海外來鴻〉。

⁹⁰ 陳文琬：〈中大校友情〉，收於香港中文大學美東校友會：《中大人在美東》（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2010年），頁71。

⁹¹ Richard MA Kam-shun, English Secretary, Students' Union, United College, "A Student Leader's Visit to the United States," *United Bulletin* 13 (May 1966): 17-18.

⁹² 〈代表本港大專學生 黎鳳慧赴美訪問〉，《新亞學生報》第15期第1版，1966

生梁偉材則於1969年1月參加第十六屆「東亞及太平洋學生領袖計劃」，由「國際生活實驗」安排他在加州大學訪學。⁹³雖然參與者如黎鳳慧對美國的民主制度感到新鮮，但黎鳳慧還是認為美國種族之間的不平等現象十分嚴重。⁹⁴

在這裡也許值得一提的是，美國於1960年代每年都吸引了大批香港青年學生赴美留學。據「國際教育協會」統計，1963年，留美香港學生有3,107人，臺灣有5,118人，日本有3,215人，南韓有2,666人。「國際教育協會」是美國當時最大美國與民間機構學術交流的非牟利機構，據其年報《門戶開放》記載，1964年的遠東留學美國人數（包含學生與學者）為33,000人，香港作為一個城市，其留美學生占3,143名，這一數字僅次於3,220的日本人數，但高於臺灣的3,057人和南韓的2,410人。⁹⁵及至1969年國際教育協會調查顯示：1968至1969年，外國留美學生共計有122,362人，遠東地區為42,630人，其中香港便占5,675人。協會調查也清晰指出，香港赴美就讀學士課程的人數，多於其他任何國家和地區。⁹⁶

吸引大批香港學生前往美國升學，相信與美國的機構為香港學生提供大量便利機會與獎學金有關。1966年秋季，據美國文化館學生留美事務諮詢處顧問柏靄蘭（英文名不詳，?-?）發言顯示獎學金的金額是十分巨大的：

美國約三千間大專學院公開給香港學生求學深造，且對本港學

年3月28日。黎鳳慧：〈游美散記之一〉，《新亞生活》第9卷第6期（1966年9月30日），頁8、10。

⁹³ 梁偉材：〈加州來鴻〉，《新亞生活》第11卷第18期（1969年3月28日），頁7。

⁹⁴ 黎鳳慧：〈游美散記之一〉，《新亞生活》第9卷第6期（1966年9月30日），頁8、10。

⁹⁵ 〈留學人數逾十萬，三萬餘人來自遠東，香港占三千一百四十人〉，《華僑日報》第3張第4頁，1964年8月7日。

⁹⁶ 〈香港學生醉心美國教育冠於世界各國〉，《華僑日報》第4張第3頁，1969年9月30日。

生無任何之限制……美國大專學院現時共有獎學金額二十八萬七千五百八十七個，獎學金共為美金九千八百一十五萬七千五百四十四元；另有研究生學位八萬四千七百九十三個，獎學金額達美金五千八百二十四萬三千六百八十一元。上述獎學金額總數共達八億多港元。⁹⁷

香港學生赴美留學的信息，來源廣泛。除了不少學生講座外，還會透過組織電影講座和播放電臺節目，以增加香港學生對留美的興趣。⁹⁸美國之音（Voice of America）透過製作播放「看看美國大學」的中文節目提升香港學生對美國教育的認知。⁹⁹學生組織大專公社也開辦留學講座，美國領事館職員親赴現場講解，向本港大專學生、高中生與感興趣的人講解留美事宜。¹⁰⁰

除了安排香港學生赴美交流，美國也十分重視香港教員的赴美受訓。1957年，美國國務院就邀請時任新亞書院教務長兼哲學系主任唐君毅（1909-1978）赴美，作為期四個月的考察。唐君毅在美國參觀了三十餘所高等教育學府和研究東方文化的機構。¹⁰¹他對美國的教育精神也有了一些認識：「美國人今日能居領導世界的地位……因為他確有一種獨特的精神」，並強調在教育事業對培養領袖人物的重要性。¹⁰²

1960年，新亞校長錢穆應美國耶魯大學邀請赴美講學，並考察

⁹⁷ 南：〈下年度美國各大專校獎學金接受港生申請可向美國文化館學生留美事務諮詢處請求指導〉，《華僑日報》第4張第2頁，1965年6月27日。

⁹⁸ 〈海外留學服務社辦留美升學電影講座〉，《華僑日報》第4張第1頁，1966年8月1日。

⁹⁹ 〈「美國之音」播新節目 留美中國學生談美高等教育〉，《工商日報》第7頁，1966年8月10日。

¹⁰⁰ 〈大專公社設特別講座指導留學美國〉，《中國學生周報》第438期第3版，1960年12月9日。

¹⁰¹ 隆：〈唐君毅已返港 曾赴歐美考察〉，《華僑日報》第4張第2頁，1957年9月18日。

¹⁰² 〈新亞書院教系開會 唐君毅講美國教育〉，《華僑日報》第4張第2頁，1957年10月29日。

美國的大學制度，為期六個月。¹⁰³他在回港後於基督教大專學生公社發表演講，贊揚美國大學的宏大規模、極具宗教性的辦學精神和對職業培訓的重視。¹⁰⁴1964年2月，聯合書院院長鄭棟材（1917-2001）也應國務院邀請，赴美考察兩個月。¹⁰⁵鄭棟材除了訪問美國大學外，還訪問了福特基金會、卡內基基金會（Carnegie Corporation of New York）及亞洲協會等重要非政府組織。¹⁰⁶鄭棟材對美國高等教育作出高度評價，他認為美國大學教育不僅有先進的科技，也有勤奮苦幹的求學精神。除了各書院的領導人物之外，中文大學其他中高層管理人員也相繼獲得美國國務院邀請進行為期一至四個月的訪問，參訪路線與上述的大同小異。¹⁰⁷

除了美國官方邀請教員赴美考察、交流外，美國的基金會還資助中大的教員訓練計劃。譬如福特基金會1965年8月捐給中文大學港幣一百七十萬，1967年又撥款港幣約三百萬資助中文大學，用以資助中文大學的師資發展計劃，讓中大教員可以遠赴海外深造。¹⁰⁸亞洲基金會資助聯合書院物理化學部（Physics and Chemistry Departments）

¹⁰³〈錢校長赴美歐行程〉，《新亞生活》第2卷第14期（1960年1月18日），頁9。

¹⁰⁴東白：〈錢穆博士演講 對美國大學教育之觀感〉，《大學生活》第6卷第15期（1960年12月16日），頁38-39。

¹⁰⁵鄭棟材除了是院長，亦是當時港府少數的華人政務官。他曾任新界南約理民府長官、徙置事務處計劃官及工商處政務官。一九五八年兼任籌備香港工業總會諮詢委員會秘書，同年，代表港府參加在曼谷舉行之遠東經濟會議。一九六〇年更臻升至首席副華民政務司，於一九六三年二月正式接任聯合書院校長。〈人物介紹——三位基本學院院長〉，《中文大學校刊》第1卷第2期（1964年7月），頁4-5。

¹⁰⁶〈學人行蹤〉，《中文大學校刊》第1卷第1期（1964年5月），頁5。

¹⁰⁷〈教職員動態〉，《聯合校刊》第11期（1965年5月），頁18。〈校務主任訪英美〉，《中文大學校刊》第1卷第8期（1965年2月），頁2。〈方副校長飛英美考察〉，《聯合校刊》第11期（1965年5月），頁16。〈陶訓導長游美歸來 接受本刊訪問〉，《新亞學生報》第1版，1966年1月28日。〈本校日誌〉，《聯合校刊》第18期（1969年3月），頁12。

¹⁰⁸該筆款項大學亦可拿出部分作其他用途，如購置典籍，計算器等。〈福特基金會贈款〉，《中文大學校刊》第3卷第8期（1967年3月），頁1。

講師去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進行特別訓練。¹⁰⁹ 這些基金會的資助對於培養香港知識社群無疑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它們為冷戰香港的社會與教育現代化發展路徑確立美式標準的這一意圖是不可忽略的，尤其是美國的資金投入對於在地知識社群的發展或知識再生產的問題是值得研究的。當然，這也不是香港獨有的問題，日本、韓國、菲律賓或臺灣諸地同樣也有相關的情況。

綜合上述所論觀之，可見中文大學在教師及學生的發展工作上，得諸美國的贊助甚多，深受美國的影響。但在一個受左翼思潮影響，甚至是以「國粹派」為主導的中文大學的學生群體中，卻存在美國的這種文化影響表達不滿，一名中文大學學生華君靖（?-?）曾指出：「中大三院實在是地道的美式文化殖民地！而絕對扯不上什麼『中國文化人』溶（作者按：應為「融」）匯『中西文化』的光彩上」。¹¹⁰ 同時也有學生公開點名批評校長李卓敏說：「來自加州的中大校長李卓敏亦提出要把中大辦成『國際化』，所謂『國際』就是美國的代稱」。¹¹¹ 這種認知將美國的文化交流解讀為殖民行爲，實質上是受左翼思潮影響的中大學生從自身所處的殖民地情境出發產生的理解。但從現有的資料來看，美國並沒有中大學生所說的文化殖民香港的意圖，還是以比較平等的方式與港開展文化交流，增進雙方對彼此文化的理解。從同時期的一些留美歸港的學生記述顯示，文化交流其實也增進了美國對香港的中華文化的了解。¹¹²

¹⁰⁹ Supplementary Training Programme for University Lecturers, *United Bulletin* 4 (July 1962): 6.

¹¹⁰ 華君靖：〈一所殖民地大學的十年〉，收於香港中文大學學會學術部編：《中大十年》（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學生會，1973年），頁72。

¹¹¹ 馬鞍山：〈從中大發展看香港政府的高等教育政策〉，《中大學生報》第7卷第2期（1975年4月），頁4-7。

¹¹² 宇：〈留美學生歸來演講 港臺學生留美近況〉，《華僑日報》第3張第1頁，1970年8月24日。

三、在地學生課外活動的資助

課外生活或課外活動，種類繁多，這裡將主要集中於討論美國非政府組織所籌辦的學生活動。譬如與美國中情局關係密切的孟氏基金會，在港高校多次舉辦徵文比賽、展覽講座、音樂會和電影放映會等多項活動。孟氏基金會不僅在浸會書院舉辦大專校際演講比賽，還邀請美國歌唱家在浸會書院開辦美國民歌音樂會。¹¹³新亞在1950年代末期在美國非政府基金組織及美國情治部門美新處、美國之音的支持下，連續開設多場音樂欣賞會、電影欣賞會等活動。「新亞音樂欣賞會委員會」也在亞洲協會、亞洲基金會與美國之音幫助下在學期和暑期多次舉辦音樂會。該委員會顧問是亞洲協會成員柯克（Grayson Kirk, 1903-1997），其音樂設備與唱片則主要由亞洲基金會資助。美國之音等文化交流機構，也會向該委員會贈送大量唱片。¹¹⁴

至於音樂的類型方面，《新亞生活》記載，主要是西方的古典音樂與美國民歌。雖然偶有中國的音樂，例如音樂會曾播放中國歌唱家斯義桂（1915-1994）唱的「中國歌曲」，但亦需是符合美國審美需

¹¹³ 琳：〈美國民曲歌唱家來港 假浸會書院演唱 由孟氏基金會編排秩序〉，《華僑日報》，1959年8月16日，第3張第4頁。琳：〈大專校際演講賽第三屆今起舉行分國粵英語三組十六日行頒獎禮〉，《華僑日報》第4張第1頁，1961年12月12日。

¹¹⁴ 柯克是美國政商學三界要人，他二戰時服務於美國國務院政治研究司安全處（the Security Section of the Department of State's Political Studies Division），戰後參與籌建聯合國安全理事會（United Nations Security Council），服務於美國外交關係協會（the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此外，柯克還是國際商業機器股份有限公司（IBM）的成員，富布萊特計劃合作機構國際教育協會的信託管理人，1953年接替艾森豪（Dwight David Eisenhower, 1890-1969）擔任哥倫比亞大學校長，是亞洲基金會和亞洲協會兩個組織的創建者，1950年代在兩個組織都擔任過主席。如此要人為處於草創階段的新亞書院的學生音樂欣賞會擔任顧問，亦從側面證明這一活動的重要性。聆聾：〈暑期音樂活動〉，《新亞生活》第2卷第6期（1959年9月21日），頁10。曾省：〈假期中的音樂會〉，《新亞生活》第1卷第8期（1958年9月15日），頁9。ACOA fact sheets, I.B.M. in South Africa, November 1971, 6.

求、服務於美國冷戰宣傳的歌曲。¹¹⁵ 據說這樣做的目的，是要「增加同學們對音樂上的知識和修養，養成一種良好的嗜好」，透過聆聽西方與美國音樂，增進學生對西方和美國文化的認識。¹¹⁶

除了音樂欣賞會，新亞也舉辦電影欣賞會。據《新亞校刊》記載，設立電影欣賞會是為了讓學生瞭解當今在美國主導下的世界新局勢，片源主要由美國新聞處或英國文化協會提供。¹¹⁷類似的電影欣賞會聯合書院也曾多次舉辦。¹¹⁸

美國資助音樂和電影欣賞會的目的是不言而喻的。美國中情局檔案就明確把「音樂」、「電影」列為冷戰武器。眾多美國非政府組織對私專院校文娛活動的資助即是美國文化冷戰或心理戰的重要戰略行動。

除了以上的課外活動，學生的第二種課外活動主要圍繞圖書館來開展。眾所周知，通過圖書閱讀足以影響學生的各種知識追求；至於刊物的種類、數目之多寡亦可以影響學生對外界事物的認知。¹¹⁹ 1959年，美新處曾為新亞書院舉辦書籍材料介紹會（Presentation of Books and Materials），並提供美金 88 元的資助。¹²⁰ 新亞書院的圖書館主要

¹¹⁵ 短笛：〈新亞音樂欣賞會〉，《新亞生活》第 1 卷第 5 期（1958 年 6 月 30 日），頁 2。

¹¹⁶ 曾省：〈假期中的音樂會〉，《新亞生活》第 1 卷第 8 期（1958 年 9 月 15 日），頁 9。

¹¹⁷ 修已：〈本校學生生活面面觀〉，《新亞生活》第 5 卷第 19 期（1963 年 4 月 19 日），頁 11。

¹¹⁸ 〈學生活動〉，《聯合校刊》第 6 期（1963 年 3 月），頁 29。

¹¹⁹ 呂迅也曾概要提及圖書館的功能在美國冷戰策略中所發揮的作用，詳見呂迅：〈香港在美國冷戰政策中的作用（1949-1955）〉，《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青年學術論壇（2010 年卷）》（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1），頁 464-465。

¹²⁰ 此處需要說明的是，1950 年代末香港的教師分為兩類，一類是持有港府認可學歷的「檢定教師」，畢業於英國與英聯邦的教育機構，另一類則是沒有港府認可的「暫准教師」，私專學人由於持有的主要是中國大學的學歷文憑，故而其待遇等同於「暫准教師」。「暫准教師」的工資大致是每月港幣 120 元至 200 元。相較於當時的教師工資水平，為一場小規模的書籍材料介紹會提供美金 88 元或等同於一名香港教師二至四個月的薪資，這

由亞洲基金會和哈佛燕京學社資助建立，並由耶魯大學提供服務與書刊材料。¹²¹ 新亞書院前校長吳俊升（1901-2000）記述從 1954 年起新亞獲得了各方幫助，但當中尤以美國的機構占絕大多數，並主導著財政發展。這些機構計有美國的雅禮協會、亞洲基金會、亞洲協會、哈佛燕京學社、洛氏基金會、孟氏基金會、美國總領事館（Consulate General of the United States in Hong Kong and Macau）等等，而英方背景的則只有英國文化協會。聯合書院亦接受美國亞洲協會聯同英國文化協會的大量捐贈。聯合圖書館的藏書至 1963 年高達四萬冊，面積占到新校舍三樓全面積的三分之一。¹²² 這一種贈書行為在中文大學成立後依然存在，1967 年 8 月 18 日香港美新處就贈送了 92 種共 161 冊的書籍給聯合書院圖書館。¹²³

崇基和聯合、新亞一樣，在草創時期同樣得到美國大力資助而得以建立圖書館。崇基圖書館的主要資金來自美國嶺南基金會（Lingnan Foundation）和哈佛燕京學社。重要的是，崇基圖書館的管理員上任前被規定必須先參加美國與臺灣教育部合辦的圖書館工作人員講習班，明確訂明要符合美方要求方可錄用。¹²⁴ 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這個組織也曾向崇基書院捐贈 600 冊由其出版的書籍，這些捐給崇基的書籍，內容都是美國著名領袖和作家關於自由和

應對當時物價而言實在不是一筆小數額。Senator Ernest Gruening, Report of A Study of United States Foreign Aid in Ten Middle Eastern and African Countries, U. 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Washington, 1 October 1963, 217. 〈聯合國港協會文化講座「尅扣教員薪金」暫準教員制度不獨有損師尊既助校長剝削又無益於學生〉，《香港工商日報》第 7 頁，1958 年 9 月 7 日。

¹²¹ The Chinese Colleges in Hong Kong, A Memorandum by the Chinese Colleges Joint Council June 1958, 16-17, CO1030/571.

¹²² *The United College of Hong Kong Calendar, 1963-1964*, p. 84, 轉引自吳倫霓霞、劉義章：〈書院的建立與發展〉，收於聯合校史編輯委員會、吳倫霓霞主編：《明德新民 聯合書院四十年》（香港：香港中文大學聯合書院，1996 年），頁 12。

¹²³ 〈圖書館簡訊〉，《聯合校刊》第 16 期（1968 年 1 月），頁 27。

¹²⁴ The Chinese Colleges in Hong Kong, A Memorandum by the Chinese Colleges Joint Council June 1958, 12, CO1030/571.

民主的演講、論著，用以宣揚美國的政治理念。¹²⁵ 自由之家是羅斯福（Franklin Roosevelt，1882-1945）在二戰時因應美國政治宣傳戰略需要而創立的組織，之後該組織服務於針對共產陣營的冷戰工作。美新處等機構積極資助圖書館的建立，熱衷建立圖書館的背後也有開展情報工作的考量。根據1961年華盛頓美新處處長威爾遜（Donald M. Wilson，?-?）為肯尼迪提供的總統備忘錄顯示，他明確指出海外圖書館、教育交換項目、文化交流中心（Binational Cultural Centers）、翻譯、出版、展覽等文化項目（Cultural Program）是不能與政治分離的，文化項目和情報項目（Information Program）二者合一方能取得更好的效果。威爾遜認為：

譬如圖書館，是美新處各地分處活動的核心。將圖書館作為一個活動基地，美新處的處長便可以與報紙編輯、電臺評論員和學生聯絡，並運用圖書館制度化支持和數據儲備對他們施加影響，開展工作。¹²⁶

姑且勿論當時受助的在地專上學院如新亞、崇基、聯合諸院校是否瞭解美方的冷戰策略，但這無阻於理解美方本身的意圖與目的。在他們大力資助香港高等院校創建、設施發展以及學生課外活動的物資支持與人力供應等等，除了有他們繼承過去一直以來在華開展的慈善事業外，也有冷戰時期立足香港、構建冷戰戰線來圍堵中共的目的。

第三種課外活動則是參觀美軍軍事設施與互訪活動，分別是：

1961年2月13日，新亞書院的課外活動日誌記載了新亞學生參觀美國航空母艦的經過。¹²⁷

¹²⁵ “Some Gifts to the College,” *Chung Chi Bulletin* 26 (April 1960): 6.

¹²⁶ Donald M. Wilson, Office of The Director, United States Information Agency Washington, Memorandum for The President January 26, 1961, Departments and Agencies Series No.7, JFKPOF-091-001. John F. Kennedy Presidential Library and Museum.

¹²⁷ 〈學生課外活動日誌〉，《新亞生活》第3卷第14期（1961年3月13日），

1962年10月5日，學生課外活動日誌記載美國旗艦樂隊來校演奏情況。¹²⁸

1962年11月5日，美國航空母艦“Bon Homme Richard”號樂隊來港演奏軍樂，新亞學生應邀參與，並將之列作校中大事。¹²⁹

1962年11月21日，新亞男子籃球隊與美國艦隊的籃球隊舉行友誼比賽。¹³⁰

1965年3月19日，新亞學生參觀美國普林斯頓號航空母艦。¹³¹

1966年3月22日，美國海軍著名樂隊（U. S. Navy Combo）到中文大學舉行演奏。¹³²

美方情治機構藉著上述軍方的聯誼活動來宣揚美國的強大軍力與外交親和力，加深美方人員與香港在地知識社群的聯繫。

除了上述的各種活動外，第四種重要的課外活動是國際學生會議。美國會邀請香港學生參加，與各國學生一起探討政治議題。學生會議共分三類。第一類是美國直接出面舉辦赴美的活動，如「亞洲大學生訪問美國」的國際學生活動。該活動為期兩個月，選擇10名亞洲學生領袖訪美，目的是為增進亞洲各大學學生領袖對美國尤其是美國學生團體活動的瞭解。1964年2月22日，中文大學聯合書院學生

頁15。

¹²⁸〈學生課外活動日誌 十月二日至十月十五日〉，《新亞生活》第5卷第9期（1962年10月26日），頁9。

¹²⁹〈本校大事記 十月一日至十月十五日〉，《新亞生活》第5卷第11期（1962年11月23日），頁3。

¹³⁰〈學生課外活動日誌 十一月十三日至十一月二十四日〉，《新亞生活》第5卷第12期（1962年12月7日），頁11。

¹³¹〈參觀美國普林斯頓號航空母艦記〉，《新亞生活》第7卷第19期（1965年4月23日），頁6。

¹³²〈本校日誌〉，《聯合校刊》第13期（1966年5月），頁8。

會副主席郭有義參與此活動，據其記載，他們考察美國大學的學生團體組織，與其會談，訪問學生會的報社、俱樂部等，觀摩及學習其運作方式。至於此次活動的作用方面，他評價道：「凡此種種，皆使亞洲大學生能充分瞭解美國大學生如何推進其學術團體活動，以及如何在大学生生活過程中，獲得各種訓練及民主自由精神」。¹³³

第二類則是由美國的亞洲盟友出面舉辦，如日本國際學生協會（The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ociation of Japan，簡稱ISA）舉辦的國際學生會議（International Student Conference，簡稱ISC）。日本國際學生協會最初成立於1934年，最初名字為「Japan English Student Association」，到1946年改為現名，在60年代已經是日本最大的全國性大學生組織。¹³⁴ 據其活動計劃書介紹，其舉辦的國際學生會議這項活動的前身是1934年始舉辦的日美學生會議（Japan-America Student Conference）。日美學生會議創辦的目的是「世界和平就是遠東和平。遠東和平依賴於日美青年人交流意見、彼此理解信賴基礎上的和平」。¹³⁵ 這一會議正式改名則是在1954年。

1963年崇基學院學生會外交部長胡廣鉅、演辯學會主席陳克寬和吳白弢前往參加第十屆國際學生會議，會議主題是「國際青年合作以促進世界和平」，與會成員除了來自日本、香港外，還來自美國、臺灣、南韓、菲律賓、新加坡、馬來西亞、印度、錫蘭、土耳其、伊拉克和加拿大，共計60餘人。7月13日至8月15日共計32天的會議中，探討了諸多國際時政問題，包括探討「各國現狀及問題」、「有關聯合國的世界領導地位及世界局勢的觀察」和「如何調和東西方文

¹³³ 〈學生會副主席赴美訪問〉，《聯合校刊》第9期（1964年7月），頁25。

¹³⁴ 吳白弢：〈第十屆國際學生會議及日本紀游〉，《崇基校刊》第34期（1963年12月），頁14。

¹³⁵ ISC64 Executive Officer: 64th International Student Conference Business Plan, 2. Retrieve from <https://bwz.uni.lodz.pl/wp-content/uploads/2011/07/ISC-64-Description.pdf>, accessed 8 March 2018.

化衝突的問題」等問題。¹³⁶

1964年，聯合書院學生郭有義、文國祺則參加第十一屆日本國際學生會，該屆的主旨是「國際學生世界和平互解」。會議總議會設在京都、大阪和神戶舉行，為期四天，彙報各成員的學生組織的歷史、政策、財務狀況和常務活動等。之後舉行的總議事會在東京日比谷三菱銀行會議廳舉行，為期兩天，會議探討的主題是「如何促使學生組織在國際合作下達到互相瞭解和認識」。¹³⁷

第三類則是美國資助與香港專上學院合辦的在港活動。1962年美國中西部青年會（Y.M.C.A The West Central Area）和香港中國青年會在8月22日聯合在港舉辦國際工作營及研討會，總共有10名美國學生參加。工作營地點設於香港的將軍澳區，研討會則在香港沙田區的基督教山林道風山上舉行，會議主旨是讓中美青年交流彼此的思想。新亞書院的譚汝謙和崇基書院的李光甫都參與其中。該會的活動主要是讓外國學生講述他們對中國文化的見解，由香港的學生對其進行糾正，以讓美國學生產生正確的中國認識。學生之間也會探討中國的時政問題。¹³⁸1965年12月27日至12月30日，亞洲基金會與日本國際學生會議資助香港專上學聯在崇基舉辦首次學生研習營，借以提升香港學生的社會意識。¹³⁹

參與這些在地研習營的學生，一方面認識到美國的先進和美國青年人的熱情，但另一方面，遇到美國青年與自身認知不同時，中文院校學生也存在從民族主義角度來理解的情況。參加國際工作營及研討會的新亞學生譚汝謙和崇基李光甫，他們都認為美國學生不理解真正

¹³⁶ 吳白弢：〈第十屆國際學生會議及日本紀游〉，頁14。

¹³⁷ 〈第十一屆國際學生會議〉，《聯合校刊》第10期（1964年12月），頁36。

¹³⁸ 譚汝謙：〈國際工作營及研討會的中美青年〉，《大學生活》第8卷第9期（1962年9月16日），頁33-37。李光甫：〈第一次國際工作營和研討會後記〉，《大學生活》第8卷第9期（1962年9月16日），頁38-40、50。

¹³⁹ “Student Seminar,” *Chung Chi Bulletin* 39 (December 1965): 5.

的中國文化，譬如用新加坡的中國家庭去介紹中國文化。¹⁴⁰ 譚汝謙認為他們「好像時常有一種優越感存在，那就是，他覺得東方人需要西方人的幫助，但西方人卻不用東方人的幫助」。¹⁴¹ 李光甫則認為：

國與國之間不是有私見嗎？種族與種族見不是有優越感的存在嗎？談中西結晶的簡直唱高調……我們中國文化是和平的文化，絕少向外征服別人，所以唯一就是要西方接受中國文化，他們既占不了中國，亡不了中國；況且又沒有客觀的接納態度，我相信，也敢相信，「中西結晶」簡直比登天更難！¹⁴²

參與的中文專上院校學生受到民族情緒的影響，固然會產生自己的理解或者對美方意圖的誤讀，但根據院校資料顯示，客觀而言，上述主要集中於探討學生課外生活中的文化冷戰活動，美方機構還是十分尊重學院的理念，不傾向干涉學校教育宗旨及學校行政。¹⁴³ 筆者在2018年7月9日對1950年代就讀於新亞書院、並於1960-1970年代也參加不少學生活動的陳志誠(??)做過口述歷史訪問。在談到美國資助時，陳志誠說：「沒有，完全沒有，你要教什麼，美國完全不干涉，美國主要是校舍，設備方面資助。在我們的理解來講，他完全沒有干預校內的行政，而且我們那個時候，學風比較自由，和現在不一樣……因為那個時候的美國，以大國自居，往往資助那些有問題、欠發展的地方」。陳志誠也不認為美國在教育活動中施加很明顯的政治意圖或者明顯帶有政治傾向的干預行為。¹⁴⁴ 這與港府作為殖民地

¹⁴⁰ 李光甫：〈第一次國際工作營和研討會後記〉，頁40。

¹⁴¹ 譚汝謙：〈國際工作營及研討會的中美青年〉，頁35。

¹⁴² 譚汝謙：〈國際工作營及研討會的中美青年〉，頁33。李光甫：〈第一次國際工作營和研討會後記〉，頁38。

¹⁴³ 錢穆：《錢賓四先生全集（五十）：新亞遺鐸》（臺北：聯經，1998年），頁291。

¹⁴⁴ 陳志誠於50年代末入讀新亞書院，之後就讀新成立的中文大學與新亞研究所，陳志誠學生時期曾獲得孟氏基金會獎助學金的資助，就讀中文大學期間也多次參與美國基金會舉辦的譬如徵文比賽的文化活動。陳學然、張

管理者而在課程與行政上進行直接管理的方式是不同的。正如前文所說，美方不能過於涉足香港地方事務，故其文化戰略只能採取一種政治色彩較弱的影響方式。美方不會直接或公開地進行鮮明的政治宣傳，主要以文化交流的形式從學生的生活習慣、行為方式、審美趣味等入手，增進學生對西方文化的興趣與認同，與共產文化產生疏離、隔閡甚至敵對的認知。

不過，如果認為美國冷戰策略在香港一一奏效或者是在地社群對美國文化價值服膺依從，則又會是過於簡化的解讀。有趣的是，多方接受國際援助特別是美國各基金會資助的新亞書院，其創辦人兼教務長唐君毅，卻幾乎在所有開學禮及畢業禮上一再熱切要求學生們要如何不忘初衷、立定心志復歸傳統、守護中國文化。¹⁴⁵ 這一方面當然可以看作是美國基金會資助新亞的本身目的所在，使新亞師生藉傳統文化抗衡共產主義的散播以及以「文化中國」來圍堵「共產中國」。不過，身處殖民地的現狀讓香港學生從殖民主義的角度來理解美國的冷戰文化交流活動。¹⁴⁶ 不過，相關探討已超出本文的篇幅與論述範圍，惟有等待另文再議。

四、總結

冷戰不同於大規模軍事武器的明刀明槍熱戰，而是遍及日常生活世界下的政治、經濟領域乃至任何與思想文化活動範疇相關的心理戰。在香港這樣一個不同敵對政治勢力同時存在的半中立區域，除了

志翔：《陳志誠口述歷史記錄》，時間：2018年7月9日，地點：香港銅鑼灣。

¹⁴⁵ 陳學然：〈見道行事：唐君毅先生的續統思想〉，《新亞學報》2011年第29期，頁249-286。

¹⁴⁶ 華君靖：〈一所殖民地大學的十年〉，收於香港中文大學學會學術部編：《中大十年》，頁72。馬鞍山：〈從中大發展看香港政府的高等教育政策〉，《中大學生報》第7卷第2期（1975年4月），頁4-7。

見諸報刊上政治鮮明的不同政見交鋒互伐外，文化戰或心理戰也無孔不入地滲入香港這一國際城市的每個角落。美國採用政治色彩較弱的形式在港進行文化冷戰，主要是受限於港府汲汲於維護自身與中共的關係，故要小心平衡美國這位盟友的在港活動，使之不會激怒北京，故而只能採取文化層面的軟性方法進入香港社會領域。諸如進入香港的教育、社會慈善服務領域的各種基金會，又或者是本源於英美合作的富布萊特計劃，在冷戰時期都被美國中央情報局用來實施反共的文化戰略。

本文主要探討了美國如何透過具情治背景的基金會和非政府組織接觸香港私立專上院校師生為其文化冷戰服務。透過私專師生進入香港的在地知識社群，各種基金會藉著捐資、文娛、康樂活動，構建細緻入微的文化心理戰體系，著力於向南下香港的文化人士及青年學生展示其民主國家的魅力，試圖藉此凝聚起一層層圍堵共產主義的力量。本文認為，美國在港實施教育交換與文化交流，雖然極力避免令參與者對交流活動背後產生甚麼「政治性」的疑慮，而其進行方式也較為尊重參與者的情感，但通過前文可見，由於這一「交流」無論是物資、人員還是組織，基本都是由美國政府提供的，香港在「交流」中對美國的依賴以及對相關調度的聽從，這也顯示了美港之間的內在關係並非對等的。香港學生固然可以有自己的不同見解，甚至有批判美國的聲音，但強大的美國金援、大量美方人員的活動和國際化的運作模式，還是成功實現了美國宣揚民主現代化、重塑亞洲的冷戰目的，使美國成為除了英方以外，在香港成就的另外一套文化價值與教育霸權。

質言之，美國的教育交換活動的確讓私專院校學生認識到美國的現代化和民主制度；其次，美國在港開展的文化活動也使得香港這一城市赴美接受高等教育深造的人數在短短數年內快速增加，相較於美國在亞洲的冷戰盟友日本和臺灣，香港留美的人數與日本相約但高於臺灣，居高不下的人數在客觀上使得香港學生受到美國文化或思想價

值的影響，進而通過教育層域中的師生關係、同學關係和校友關係來建立港美人員的相互聯繫網絡；第三，港美之間建立一套體系化、國際化的「交流」制度，令美國可以對港發揮長遠的影響，香港中文大學甫成立便與美國加州大學建立起的交流系統便是當中的表表者。

然而，美國對於香港的社會影響力也不見得是水銀瀉地般無孔不入；而美國推動文化交流戰略的理念是圍繞著「自由世界」與「共產陣營」這兩大思想框架展開，希望參與者最後能夠擁抱強大的「自由世界」而對「共產陣營」產生距離。不過，美國的文化價值或教育霸權，也不是盡如美方所願般效果完美。香港與同樣接受美國教育交換計劃的臺灣在這方面便有明顯的區別。香港在 1960 年代畢竟仍是英人管治的殖民地，而背靠大陸且大陸居民源源不絕湧入香港的現實狀態，讓香港的學生在國族認知上不同於臺灣。在港學生一直受到戰後民族主義、「殖民」主義批判影響，甚至是深受左翼思潮的衝擊，這樣就形塑了香港人與香港社會的思想複雜性與都市文化的獨特性。

本文欲於此進一步指出的是，現時有關「文化冷戰」的研究過於側重媒體出版等文宣層面之故，多是忽視了借助文化冷戰活動開展的人員網絡和制度變更以至於接軌的長期影響力；「交流」在冷戰的框架下，其活動宣揚的內容並非是唯一的重點，借助「交流」活動建立的人員網絡和制度產生的影響很可能是更值得關注的深層內容。畢竟，不少當年曾經參與本文所說的冷戰「交流」的組織或人員，時至今天仍然發揮著影響力。

分析一眾私專在發展過程中的美國因素或中文大學成立後的國際交流活動，有助釐清香港冷戰時期極為複雜、多元但又曖昧、混雜的社會結構與知識網絡，也填補了冷戰時期香港大專學界「民主」文化形成及發展的一個空白，這些對於了解香港的知識體系構成無疑有積極的幫助，對於進一步了解冷戰時期其他受美元資助地區的文教機構發展或知識再生產的課題同樣也會有借鑒的作用。

徵引書目

專書與專書論文

吳倫霓霞、劉義章：〈書院的建立與發展〉，收於聯合校史編輯委員會、吳倫霓霞主編：《明德新民 聯合書院四十年》，香港：香港中文大學聯合書院，1996年，頁3-21。

吳國坤：〈冷戰時期香港電影的政治審查〉，收於黃愛玲、李培德編：《冷戰與香港電影》，香港：香港電影資料館，2009年，頁53-69。

吳康民口述，方銳敏整理：《吳康民口述歷史：香港政治與愛國教育（1947-2011）》，香港：三聯書店，2011年。

呂迅：〈香港在美國冷戰政策中的作用（1949-1955）〉，《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青年學術論壇（2010年卷）》，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1年，頁439-466。

周愛靈：《花果飄零：冷戰時期殖民地的新亞書院》，香港：香港商務印書館，2010年。

區志堅：〈非僅指的是吃苦奮鬥——從《新亞校刊》看五十年代「新亞精神」的實踐〉，鮑紹霖、黃兆強、區志堅主編：《北學南移：港臺文史哲溯源（文化卷）》，臺北：秀威出版社，2015年，頁233-266。

陳文琬：〈中大校友情〉，香港中文大學美東校友會，《中大人在美東》，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2010年，頁70-73。

陳方正：《用廬憶舊》，廣東：廣東人民出版社，2016年。

陳學然：《五四在香港：殖民情境、民族主義與本土意識》，香港：中華書局，2014年。

麥志坤著，林立偉譯：《冷戰與香港：英美關係 1949-1957》，香港：中華書局，2018年。

- 華君靖：〈一所殖民地大學的十年〉，收於香港中文大學學會學術部編：《中大十年》，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學生會，1973年，頁72。
- 葉霖：《在中國的影子下：美國對香港的外交政策1945-1972》，香港：中華書局，2018年。
- 錢穆：《八十憶雙親·師友雜憶》，臺北：東大，1983年。
- 錢穆：《錢賓四先生全集（五十）：新亞遺鐸》，臺北：聯經，1998年。
- 羅永生：《勾結共謀的殖民權力》，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15年。
- 羅永生：《殖民家國外》，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14年。
- Eichengreen, Barry. "Lessons from the Marshall Plan." In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Background Papers*.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2011.
- Lu, Xun. "The American Cold War in Hong Kong 1949-60: Intelligence and Propaganda." In *Hong Kong in the Cold War*, edited by Priscilla Roberts and John M. Carroll, 117-140.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16.
- Peterson, Glen. "Crisis and Opportunity: The Work of Aid Refugee Chinese Intellectuals (ARCI) in Hong Kong and Beyond," In *Hong Kong in the Cold War*, edited by Priscilla Roberts and John M. Carroll, 141-158.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16.
- Roberts, Priscilla. "Cold War Hong Kong Juggling Opposing Forces and Identities." In *Hong Kong in the Cold War*, edited by Priscilla Roberts and John M. Carroll, 46.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16.
- Schwartz, Eugene G. ed. *American Students Organize Founding the National Student Association After World War II*. Westport, Conn: American Council on Education, 2006.
- Tsang, Steve. *Democracy Shelved: Great Britain, China, and Attempts at Constitutional Reform in Hong Kong, 1945-1952*. Hong Kong;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 The Committee on Scholarly Communication with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 Relationship Restored: Trends in U.S.-China Educational Exchanges, 1978-1984*. Washington D.C.: National Academy Press, 1986.
- U. S. Department of Health Education and Welfare, Office of Education. *Exchange Teaching Abroad Under Public Law 584 79th Congress the Fulbright Act*.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Washington, 1953.
- Wong, Ting-Hong. *Hegemonies Compared: State Formation and Chinese School Politics in Postwar Singapore and Hong Kong*.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2002.

期刊論文

- 于 群、程舒偉：〈美國的香港政策（1942-1960）〉，《歷史研究》1997年第3期，頁53-66。
- 王厚生：〈論以自助為基礎的美國外交政策〉，《再生》1950年第258期，頁2。
- 王梅香：〈文學、權力與冷戰時期美國在臺港的文學宣傳（1950-1962年）〉，《臺灣社會學刊》2015年第57期，頁1-51。
- 吳國坤：〈以影犯禁：冷戰，瘟疫，諜戰〉，《中國文學學報》2011年第2期，頁313-326。
- 李聯明、汪霞：〈高等教育國際化進程中的美國「富布萊特計劃」評說〉，《河北師範大學學報》第8卷第6期，2006年11月，頁49-52。
- 胡禮忠：〈富布萊特項目與中美教育交流〉，《國際觀察》2000年第5期，頁43-48。
- 孫大廷、孫偉忠：〈美國高等教育國際化政策的文化輸出取向——以「富布賴特計劃」為例〉，《黑龍江高教研究》2009年第181期，頁53-55。
- 崔建立：〈富布萊特項目對我國國際文化教育交流的啟示〉，《東北師

- 大學報》2011年第250期，頁187-191。
- 崔建立：《冷戰時期富布萊特項目與美國文化外交》，長春：東北師範大學，2011年。
- 張 楊：〈冷戰共識——論美國政府與基金會對亞洲的教育援助項目（1953-1961）〉，《武漢大學學報（人文科學版）》第66卷第3期，2013年5月，頁60-68。
- 張 楊：〈亞洲基金會：香港中文大學創建背後的美國推手〉，《當代中國史研究》第22卷第2期，2015年3月，頁91-102。
- 郭永虎：〈20世紀五六十年代美國在香港的意識形態宣傳和滲透〉，《當代中國史研究》第2期，2016年3月，頁16-24。
- 陳學然：〈見道行事：唐君毅先生的續統思想〉，《新亞學報》2011年第29期，頁249-286。
- 翟 韜：〈冷戰紙彈：美國宣傳機構在香港主辦中文書刊研究〉，《史學集刊》2016年第1期，頁71-83。
- 翟 韜：〈美國對東南亞華人宣傳政策的演變（1949~1964）〉，《美國研究》2013年第1期，頁117-137。
- 羅永生：〈「火紅年代」與香港左翼激進主義思潮〉，《二十一世紀》第161期，2017年6月，頁71-83。
- Fulbright, J. William. "The First Fifteen Years of the Fulbright Program." *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335 (May, 1961): 23.
- Haas, J. "60 Years of Marshall Plan Aid: A Critical Appraisal from an Austrian Perspective." *Monetary Policy & the Economy* 2 (2007): 126-139.
- Majander, Mikko. "The Limits of Sovereignty. Finland and the Question of the Marshall Plan in 1947." *Scandinavian Journal of History* 19 (1994): 309-326.
- Wetzel, Charles J. "Peace Corps in Our Past." *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365 (May, 1966): 1-11.

Wong, Ting-Hong. "Comparing State Hegemonies: Chinese Universities in Postwar Singapore and Hong Kong."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of Education* 26, no. 2 (April 2005):199-218.

政府檔案

ACOA fact sheets, I.B.M. South Africa. November 1971, 6.

Arthur Schlesinger, Jr. Memorandum for the President. Subject: Reception for Foreign Students. 8 May 1963. Folder Title: Education, JFKPOF-101-003-p0059, JFKPOF-101-003-p0060, John F. Kennedy Presidential Library and Museum. 1-2.

B. P. Schoyer, Treasurer, Chinese Colleges Joint Council, to Director of Education. 21 November 1961, HKRS:147, D&S:3/14.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14 April 1959.

Chronology of the 40 Committee. LOC-HAK-331-4-24-3, CIA Library.

Donald M. Wilson, Office of The Director, United States Information Agency Washington. Memorandum for the President January 26, 1961. Departments and Agencies Series No.7, JFKPOF-091-001. John F. Kennedy Presidential Library and Museum.

Extract from Hong Kong Police Special Branch Report. Origin on FED 62/402/01, CO1030/1605.

From Hong Kong Sir R. Black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for the Colonies. 17 January 1964, CO 1030/1535.

K. E. Priestley: Is it desirable or necessary that post-secondary colleges in Hong Kong should be employed to grant degree following courses given in the medium of Chinese. 1 August 1957, 6.HKRS 163-1-2048.

Letter, Mallory-Browne to Qian Mu. October 25,1961, AF P-171. Cited from Chou, Grace Ai-Ling. *Confucianism, Colonialism, and the Cold War: Chinese Cultural Education at Hong Kong's New Asia College, 1949-63*.

Leiden; Boston: Brill, 2012, 179.

Memorandum, "US Policy on Hong Kong," James S. Lay, JR. Executive Secretary to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11 June 1960, NSC6007/1.

Mrs Donaldson Ackerman Chairman of Foreign Student Day Committee to the President the White House Washington, D.C.. 3 November 1961. JFKPOF-101-003-p0032. John F. Kennedy Presidential Library and Museum.

Note of a meeting between Sir A. Cohen and Dr. Choh-Ming Li (Vice-Chancellor of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at the D.T.C on 28 January 1964. CO 1030/1535.

Public Law 87-256. September 21, 1961. (H.R.8666), Mutual Educational and Cultural Exchange Act of 1961. Sec.102,103,104, 528-532.

Sec.101. Statement of purpose, Public Law 87-256, September 21, 1961. (H.R.8666), Mutual Educational and Cultural Exchange Act of 1961. 527.

Section D. L.D. Battle, Executive Secretary, Subject: Presidential Meetings with Foreign Students, Memorandum for Mr. McGeorge Bundy the White House, 29 September 1961, p4. Folder Title: Education, JFKPOF-101-003-p0026. John F. Kennedy Presidential Library and Museum.

Senator Gruening, Ernest. Report of A Study of United States Foreign Aid in Ten Middle Eastern and African Countries. U. 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Washington. 1 October 1963, 217.

Special Task Assignment for PSB (Inventory of Cold War Weapons). 24 September 1951. CIA-RDP80-01065A000400070028-7.

"The 12th Semiannual Report of the International Educational Exchange Program of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transmitted to the Congress on March 22, 1954,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Bulletin* 30, no.771. Publication

5420. CIA-RDP60-00442R000100140003-6, 5 April 1954.

The Chinese Colleges in Hong Kong, A Memorandum by the Chinese Colleges Joint Council. June 1958. CO1030/571, pp.16-17.

報紙

〈行總舞弊案，李卓敏等九名下不起訴處分〉，《華僑日報》第1張第1頁，1947年12月20日。

隆：〈唐君毅已返港 曾赴歐美考察〉，《華僑日報》第4張第2頁，1957年9月18日。

〈新亞書院教系開會 唐君毅講美國教育〉，《華僑日報》第4張第2頁，1957年10月29日。

〈聯合國港協會文化講座「超扣教員薪金」暫準教員制度不獨有損師尊既助校長剝削又無益於學生〉，《香港工商日報》第7頁，1958年9月7日。

琳：〈美國民曲歌唱家來港 假浸會書院演唱由孟氏基金會編排秩序〉，《華僑日報》第3張第4頁，1959年8月16日。

〈大專公社設特別講座指導留學美國〉，《中國學生周報》第438期第3版，1960年12月9日。

琳：〈大專校際演講賽第三屆今起舉行分國粵英語三組十六日行頒獎禮〉，《華僑日報》第4張第1頁，1961年12月12日。

〈留學人數逾十萬，三萬餘人來自遠東，香港占三千一百四十人〉，《華僑日報》第3張第4頁，1964年8月7日。

南：〈下年度美國各大專校獎學金接受港生申請可向美國文化館學生留美事務諮詢處請求指導〉，《華僑日報》第4張第2頁，1965年6月27日。

〈海外留學服務社辦留美升學電影講座〉，《華僑日報》第4張第1頁，1966年8月1日。

〈「美國之音」播新節目 留美中國學生談美高等教育〉，《工商日報》

第7頁，1966年8月10日。

〈九龍愛國教師集會組織起來鬥港英通過決議堅決響應各界鬥委會的號召〉，《大公報》第1張第3版，1967年5月29日。

〈港九學生界歡迎新界學生組成鬥委會，反帝隊伍壯大〉，《大公報》第1張第3版，1967年6月10日。

〈香港學生醉心美國教育冠於世界各國〉，《華僑日報》第4張第3頁，1969年9月30日。

宇：〈留美學生歸來演講 港臺學生留美近況〉，《華僑日報》第3張第1頁 1970年8月24日。

校園刊物

〈校聞點滴〉，《崇基校刊》第11期，1957年7月，頁23。

〈校聞匯志〉，《崇基校刊》第15期，1958年5月，頁16。

〈本院兩周大事〉，《新亞生活》第1卷第4期，1958年6月16日，頁3。

短 笛：〈新亞音樂欣賞會〉，《新亞生活》第1卷第5期，1958年6月30日，頁2。

曾 省：〈假期中的音樂會〉，《新亞生活》第1卷第8期，1958年9月15日，頁9。

《新亞生活》第1卷第13期，1958年11月24日，頁3。

〈大學教育的三種意義——羅維德博士在第十四次月會講詞〉，《新亞生活》第1卷第14期，1958年12月8日，頁1。

〈本院三周大事〉，《新亞生活》第1卷第15期，1958年12月22日，頁5。

〈本院五周大事 一月十二日至二月二十日〉，《新亞生活》第1卷第17期，1959年1月20日，頁3。

〈本院兩周大事〉，《新亞生活》第1卷第18期，1959年3月16日，頁2。

耀 童：〈新任雅禮協會代表 蕭約先生簡介〉，《新亞生活》第2卷第6期，1959年9月21日，頁8。

- 聆 聾：〈暑期音樂活動〉，《新亞生活》第2卷第6期，1959年9月21日，頁10。
- 〈本校兩周大事記，1959年11月12日至11月30日〉，《新亞生活》第2卷第11期，1959年11月30日，頁2。
- 〈本校兩周大事記〉，《新亞生活》第2卷第12期，1959年12月14日，頁3。
- 〈錢校長赴美歐行程〉，《新亞生活》第2卷第14期，1960年1月18日，頁9。
- 〈系會及社團動態〉，《崇基校刊》第27期，1960年7月，頁22。
- 東 白：〈錢穆博士演講對美國大學教育之觀感〉，《大學生活》第6卷第15期，1960年12月16日，頁38-39。
- 〈學生課外活動日誌〉，《新亞生活》第3卷第14期，1961年3月13日，頁15。
- 〈本校大事記 一九六〇年八月至六一年一月〉，《聯合校刊》第2期，1961年4月，頁21。
- 《新亞生活》第3卷第17期，1961年4月24日，頁5。
- 布魯姆：〈國際學生交換——亞洲人士的觀念與美國應負的責任〉，《大學生活》第7卷第9期，1961年9月16日，頁11-13。
- 《崇基校刊》第28期，1961年10月，頁21。
- 〈本校大事記 一九六一年三月至一九六二年一月〉，《聯合校刊》第3期，1962年1月，頁17。
- 《新亞生活》第4卷第12期，1962年1月13日，頁2。
- 〈校聞撮錄〉，《崇基校刊》第30期，1962年7月，頁27。
- 李光甫：〈第一次國際工作營和研討會後記〉，《大學生活》第8卷第9期，1962年9月16日，頁38-40，50。
- 譚汝謙：〈國際工作營及研討會的中美青年〉，《大學生活》第8卷第9期，1962年9月16日，頁33-37。
- 〈學生課外活動日誌 十月二日至十月十五日〉，《新亞生活》第5卷第9

- 期，1962年10月26日，頁9。
- 葉小梅：〈從赤域說起〉，《崇基校刊》第31期，1962年10月，頁12、17。
- 〈學生課外活動日誌 十一月十三日至十一月二十四日〉，《新亞生活》第5卷第12期，1962年11月21日，頁11。
- 〈本校大事記 十月一日至十月十五日〉，《新亞生活》第5卷第11期，1962年11月23日，頁3。
- 〈本校日誌〉，《聯合校刊》第6期，1963年3月，頁14。
- 〈學生活動〉，《聯合校刊》第6期，1963年3月，頁29。
- 修 已：〈本校學生生活面面觀〉，《新亞生活》第5卷第19期，1963年4月19日，頁11。
- 〈本校大事記三月十一日——三月三十一日〉，《新亞生活》第5卷第19期，1963年4月19日，頁3。
- 〈本校日誌〉，《聯合校刊》第7期，1963年7月，頁6。
- 《新亞生活》第6卷第11期，1963年11月15日，頁3。
- 吳白弢：〈第十屆國際學生會議及日本紀游〉，《崇基校刊》第34期，1963年12月，頁14。
- 〈校聞剪輯〉，《崇基校刊》第35期，1964年4月，頁19。
- 〈學人行蹤〉，《中文大學校刊》第1卷第1期，1964年5月，頁5。
- 〈人物介紹——三位基本學院院長〉，《中文大學校刊》第1卷第2期，1964年7月，頁4-5。
- 〈學生會副主席赴美訪問〉，《聯合校刊》第9期，1964年7月，頁25。
- 〈第十一屆國際學生會議〉，《聯合校刊》第10期，1964年12月，頁36。
- 陳國存：〈赤域之憶想〉，《崇基校刊》第37期，1965年1月，頁26。
- 〈校務主任訪英美〉，《中文大學校刊》第1卷第8期，1965年2月，頁2。
- 〈參觀美國普林斯頓號航空母艦記〉，《新亞生活》第7卷第19期，1965

- 年4月23日，頁6。
- 〈方副校長飛英美考察〉，《聯合校刊》第11期，1965年5月，頁16。
- 〈教職員動態〉，《聯合校刊》第11期，1965年5月，頁18。
- 陳勝長：〈美國六十八日〉，《新亞生活》第8卷第3期，1965年6月18日，頁6。
- 《新亞生活》第8卷第8期，1965年11月5日，頁7。
- 〈陶訓導長游美歸來 接受本刊訪問〉，《新亞學生報》第1版，1966年1月28日。
- 馬金順：〈海外來鴻〉，《聯合學生》第3號第1版，1966年2月。
- 〈代表本港大專學生 黎鳳慧赴美訪問〉，《新亞學生報》第15期第1版，1966年3月28日。
- 馬金順：〈美國七十日〉，《聯合學生》第5號第2版，1966年4月。
- 陳勝長：〈美國六十八日〉，《新亞生活》第8卷第17期，1966年4月1日，頁13-14。
- 〈本校日誌〉，《聯合校刊》第13期，1966年5月，頁8。
- 《新亞生活》第9卷第2期，1966年6月10日，頁7。
- 陳勝長：〈美國六十八日〉，《新亞生活》第9卷第3期，1966年6月24日，頁14-15。
- 〈殷巧兒赴美訪問——出席遠東學生領袖研討會〉，《聯合學生》第9號第1版，1966年8月。
- 黎鳳慧：〈游美散記之一〉，《新亞生活》第9卷第6期，1966年9月30日，頁8、10。
- 〈學生活動〉，《崇基校刊》第41期，1966年12月，頁46。
- 〈福特基金會贈款〉，《中文大學校刊》第3卷第8期，1967年3月，頁1。
- 〈殷巧兒出席第十屆遠東學生領袖觀摩會〉，《聯合校刊》第15期，1967年7月，頁42。
- 《新亞生活》第10卷第6期，1967年10月13日，頁15。

- 〈大學新聞〉，《崇基校刊》第43期，1967年12月，頁49。
- 〈本院續與海外大學建立學術合作關係〉，《聯合校刊》第16期，1968年1月，頁4。
- 〈圖書館簡訊〉，《聯合校刊》第16期，1968年1月，頁27。
- 〈聘任事項〉，《中文大學校刊》第4卷第10期，1968年7月，頁2。
- 〈學人行蹤〉，《中文大學校刊》第4卷第11期，1968年8月，頁7。
- 陳永洸：〈海外歸鴻之二〉，《聯合校刊》第17期，1968年8月，頁39-40。
- 〈陳文琬、顧爾言先後出席遠東學生領袖觀摩大會〉，《聯合校刊》第17期，1968年8月，頁40。
- 《新亞生活》第11卷第5期，1968年9月9日，頁8。
- 〈本校日誌〉，《聯合校刊》第18期，1969年3月，頁12。
- 梁偉材：〈加州來鴻〉，《新亞生活》第11卷第18期，1969年3月28日，頁7。
- 〈大學新聞〉，《崇基校刊》第46期，1969年6月，頁47-48。
- 〈大學新聞〉，《崇基校刊》第47期，1969年12月，頁18。
- 展：〈新亞書院與雅禮協會合作經過參考資料〉，《新亞生活》第13卷第15第16期合刊，1971年2月10日，頁9-10。
- 馬鞍山：〈從中大發展看香港政府的高等教育政策〉，《中大學生報》第7卷第2期，1975年4月，頁4-7。
- “Some Gifts to the College,” *Chung Chi Bulletin* 26, April 1960, 6.
- United Bulletin* 1, July 1960, 10.
- United Bulletin* 4, July 1962, 6.
- The United College of Hong Kong Calendar, 1963-1964*, p.84, 轉引自吳倫霓霞、劉義章：〈書院的建立與發展〉，收於聯合校史編輯委員會、吳倫霓霞主編：《明德新民 聯合書院四十年》，香港：香港中文大學聯合書院，1996年，頁12。
- “Student Seminar,” *Chung Chi Bulletin* 39, December 1965, 5.

“Exchange Agreement Renewed,” *Chinese University Bulletin* 2 No. 9, April 1966, 1.

MA, Richard Kam-Shun, “A Student Leader’s Visit to the United States,” *United Bulletin* 13, May 1966, 17-18.

Hoadley, Steve, “Potential Political Participants?” *Chung Chi Bulletin* 43, December 1967, 43-47.

Schoyer, B. Preston, “Memories of New Asia,” 《新亞生活》第13卷第15期合刊，1971年2月10日，頁26-28。

OchTamale: News for Alumni & Friends of the University of Redlands 87, no. 3, 2011, p. 30.

口述歷史

陳學然，張志翔：《陳志誠口述歷史記錄》，時間：2018年7月9日，地點：香港銅鑼灣。

網路資料

Jaco：〈原來當年的學運是這麼的一回事〉，《中大學生報》2012年迎新特刊，轉載自《中大學生報》網站：<http://cusp.hk/?p=2830> 中大學生報，檢索日期：2019年5月5日。

ISC64 Executive Officer: *64th International Student Conference Business Plan*, p2. Retrieve from <https://bwz.uni.lodz.pl/wp-content/uploads/2011/07/ISC-64-Description.pdf>, accessed 8 March 2018.